

古本與寫本：近代有關《左傳》編纂議題的 學術考察與反思*

蔡瑩瑩**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摘 要

《左傳》敘事富贍，其性質與編纂議題，歷來討論不衰。從清末至今，更因學風遞變、考古發掘、西潮東進等因素，讓此議除了兼具經學、史學意義外，更觸及「信古」或「疑古」之辯證，乃至如何面對出土文獻與寫本研究等新材料、新觀念的思索。

本文回顧近代《左傳》編纂議題。首先梳理清代學者對春秋經傳「古本」的追求與延伸出的「文本型態」復古；以此為基礎，重省劉逢祿提出《左氏》「舊文」之學術史特色。次則述評古史辨學派以降「史料考證」學風，呈現《左傳》學面臨經史轉軌，乃至其史料價值受到重視，與西方漢學的專業化時機接軌的歷程。最後，提出《左傳》現存寫本與出土文獻進行兩項個案分析，期能對當今《左傳》與古代歷史編纂之議，提供反思與討論。

關鍵詞：《左傳》，漢學，歷史編纂，出土文獻，寫本

* 本文為筆者 112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世變與會通：近代中西學術交流視野下的《左傳》敘事、詮釋與譯著研究」（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845-037-）之部分成果，感謝研究助理姜如蔚、陳映儒同學協助蒐輯資料、查核原文。本文初稿曾宣讀於夏威夷大學主辦，「2022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HICCS)」(檀香山：2022 年 1 月 3-5 日)。承蒙與會同道提點討論，對筆者多有啟發。修訂稿復蒙《清華學報》不具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使本文得以補苴訂謬，謹此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yingsai37@utapei.edu.tw

一、前言

通觀古今治《左傳》者，若有哪些無法迴避的重大議題，則其性質與編纂爭議必然榜上有名。所謂性質，主要環繞其作者為誰，是否傳《春秋》等經學史著名論題；所謂編纂，則《左傳》作為先秦時期最豐富宏大的歷史著作，學者多好奇於其究竟取用過哪些史料，又是如何編纂而成？

這些議題，迄今累積諸多論述；但更具體來說，「性質」與「編纂」二議，自清末到近世，又互有關涉，不僅論述更加多元，也同時引發許多新的思考甚至爭議。舉例而言，劉逢祿宣稱《左氏春秋》與孔子《春秋》無涉，可說在「性質」一議上，提出了顛覆性的見解；然其論證手法，則從「編纂」著手，嘗試條分縷析地指出後人竄亂之跡（詳下文第三節）。又如《劍橋中國文學史》第一章〈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曾指出《左傳》敘事具有「建構性與拼湊性」，¹乍看對《左傳》之「編纂」提出異議，但實則是因為作者特別強調早期中國手抄本的不穩定特性，這也可說是立基於另一種「性質」的認識。²

從清末到近代，正如思想史研究者已梳理過這段時期的學術發展，乃從清儒好古尊漢的「信之深」，轉變為民初學者考辨古史的「疑之勇」；³則學者對《左傳》的認識與論述，究竟具體歷經哪些不同階段的發展變化？此外，在此中西薈萃而激盪的時期——歐美漢學正走向「專業化」，⁴而中國學界則戮力西化、追求「科學化史學」——則此時的《左傳》學議題，在不同學術眼光下，又開展出哪些新視角？

更有甚者，近世以來，出土文獻、寫本研究等新材料與新觀念的出現，對於《左傳》編纂與性質議題，又帶來新的對話與不同視野。以出土文獻言，隨著大量

¹ 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劉倩等譯，《劍橋中國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80。

² 案：該章節作者為柯馬丁（Martin Kern），本文第四節將就此議繼續討論。關於《劍橋中國文學史》，尤其是著重物質文化的特色，相關書評可參看伊維德（Wilt L. Idema）著，丁涵譯，〈關於中國文學史中物質性的思考〉，《中正漢學研究》，21.1（嘉義：2013），頁1-14；謝薇娜（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文學史的建構：從歐洲漢學的書寫傳統論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1（臺北：2018），頁61-89。

³ 語出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頁74。

⁴ 有關「歐美漢學／西方漢學」的歷史與發展，可參看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漢學在20世紀東西方各國研究和發展的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何寅主編，《國外漢學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9）。

先秦文書、文獻問世——尤其近年清華大學、安徽大學購藏竹簡，頗有與《左傳》性質相似的歷史類作品，拓展了傳統史學視野，帶來了新的研究範式。其中最直接的改變，即是能以出土歷史類文獻與《左傳》相參照，並從中觀察、比較史書體式、歷史情節在不同文獻中的編排差異，這對於傳統上關於《左傳》如何編纂的討論，無疑帶來新的思考與突破之可能。

出土文獻還帶來第二項影響：除內容與傳世文獻多有不同外，其基本性質為抄／寫本 (manuscript)，又涉及近年引介「寫本研究」(manuscript study) 重新看待先秦古書的趨勢。寫本研究乃就手寫的文本，進行由「外」至「內」的分析，包含：

1. 形制 (codicology)：觀測物質載體，如材料、裝訂、書寫工具、顏料等，屬考古學、科學層面。
2. 視覺型態 (visual organization)：分析視覺符號，如文本佈局 (layout)、顏色、文字、標誌、圖畫、裝飾等，屬藝術史層面。
3. 書寫 (writings) 分析：分析文字、圖式、圖畫，考察書手或畫家等，屬文字學、圖像學、藝術史層面。
4. 內容 (content) 分析：研究文本性質如文書、文獻、圖畫等，也包含文本之所指 (signified) 語言思維內容，屬文獻學、文史哲層面。⁵

從外而內，可說由「物質」逐漸步入「非物質」。後者在傳統研究中並不陌生；而關於文本的物質性，先秦文獻研究在過去受限於考古材料太少，現今則可謂方興未艾。此一重視物質特性的視角，學者或形容為將「文獻／文本」作為「文物」進行考察（詳本文第四節）。則《左傳》性質又面臨了新的討論：作為傳世典籍，真的可能被視為「文物」嗎？不論然否，又如何與寫本研究有對話的可能？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希望透過回顧清末到近代與《左傳》編纂相關的討論，依次省察並分析中、外學人對下列議題的論述：清代的好古風氣下，學者對《左傳》之編纂、古本之樣貌，有過哪些具體的設想與論述？中、西學者看待《左傳》文本的不同態度，延伸出不同的詮釋路線，其學術意義為何？有無溝通的可能？近期出土文獻與寫本研究的材料與方法，對傳統《左傳》研究有什麼影響與參考價值？

⁵ 相關研究參看 Vito Lorusso et al., "Searching for a Definition of 'Manuscript,'" *CSMC Occasional Paper*, 1 (2015), pp. 1-12. 並感謝德國漢堡大學寫本研究中心傅敏怡 (Michael Friedrich) 教授提供相關建議與討論。

二、清代學者對春秋經、傳「古本」的追尋

論及清代《春秋》、《左傳》學，「好古尊漢」是其重要特徵，誠如張素卿言：

相對於宋儒繼絕學而直承孔、孟，清儒則以重祧兩漢，而振興其散佚不傳之學自任。而其所以尊「漢」，又是由於兩漢近古而不雜道、釋，尤其漢儒重視師法，學有所承，若能據此上溯淵源於孔門，何嘗不是值得嘗試的途徑之一？……基於此一信念，清人孜孜於輯佚，逐漸將散佚已久的漢儒經說再度聚集，略復舊觀。⁶

清儒對於晉唐以降經說，頗多不滿，故其尊「漢」，乃冀望經由去古未遠的漢儒「舊注」，探尋經典古義，並「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失」。⁷

關於清代學術好古、復古之風，學界討論甚眾，余英時、王汎森、林慶彰都曾分析其「返求聖經」、「回向原典」的學術心理。⁸ 此種求真、求古的精神，又未以「漢儒舊注」自限，循著「返求聖經」的思路：假若能復原漢人所見，甚至比漢代更早的古書面貌，豈不更貼近清儒的理想學術境界？

本節指出，清代學者的《春秋》、《左傳》研究，除輯存、考辨「古義」與「舊注」外，亦可見若干標榜恢復「古經」或「古本」的嘗試。此研究取向，關注先秦古書之形貌，在現今寫本研究的概念下，值得我們加以留意。

⁶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五南圖書出版，2020），頁273。

⁷ 語見洪亮吉著，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2004），〈序〉，頁2。

⁸ 見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1999），〈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頁405-486；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林慶彰，《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明末清初經學研究的回歸原典運動〉，頁333-360；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這些研究指出，為探求「聖人」之意與解決內部義理的紛爭，學術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回向原典」的訴求。王汎森由此觀點梳理從漢乾嘉到民初的學術風潮，對於古書古史的態度轉折發展；林慶彰以此詮釋明末清初從理學到「正經運動」的轉折。

(一) 聖經已非舊：清儒的「文本型態」復古

俞樾 (1821-1907)《古書疑義舉例·序》曾曰：

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簍也。⁹

此一認識，一般用以解釋經典文字何以產生異文或譌誤，但若以「寫本」相關概念分層參照，則可見出清儒所重視者，頗有獨到之處。如前述，一個文本由外至內，可分為：1. 形制、2. 視覺型態、3. 書寫、4. 內容。吾人熟悉的傳統考證訓詁之學，多屬第四「內容」層面的探究。俞樾所論，則確實也涉及形制（簡、縑、紙）與書寫（大小篆、隸書、真書）兩層。此種關注，實即意識到「古書」的文本性，不僅涉及形上的意義文本，也察覺形下的物理文本。

《春秋》經、傳的文本形制與書寫方式，自然也經歷「古、篆、隸之遞變，簡、縑、紙之迭代。」¹⁰ 俞樾之外，更有若干清代學者不止輯佚舊注、探討古義等「內在／內容」方面的復古；更意圖追索經典「外在」的視覺樣貌，即包含：形制層面之書寫載體，視覺型態層面之文本編排樣式、章節或經傳分隔；以及書寫層面之古文字形體探討。本文稱之為「文本型態」¹¹之復古，以區別於輯佚舊注、探討故訓的「內在」之復古。

以主題言，「文本型態」之復古，可概分為：1. 恢復《春秋》古經、2. 恢復經傳舊貌、3. 恢復《左傳》古本。前二者下文將一併討論。而第三項《左傳》古本之議，乃本文討論焦點所在，於本節（二）論述。

毛奇齡 (1623-1713) 據杜預「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¹²一語發揮，

⁹ 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6。

¹⁰ 語見鍾文烝撰，駢宇騫、郝淑慧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20，頁568。

¹¹ 此稱呼強調的是文本外在視覺可觀的樣貌，可稱「形制」或「型態」。「形制」涉及物質載體（如竹簡、帛書），考量到《春秋》、《左傳》目前未有實際出土的文本，實無法探討；而「型態」指涉文本視覺呈現的樣貌佈局，就此而言，則清儒做出相關推論在一定程度仍具參考價值（詳下文），故取捨後稱為「文本型態」。

¹² 杜預注，孔穎達疏，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影印），卷1，《春秋經傳集解·序》，頁8。以下引《左傳》皆據此本，為免繁瑣，謹於引文後標明卷數頁碼，不另出注。

提出古者書寫制度上乃有「簡、策」之別，¹³ 即「《傳》據策書、《經》據簡書」：

特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單策為簡，聯簡為策。策者，冊也，以編合竹簡，合兩丹為一冊……。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¹⁴

又說：

誠以《春秋》記事，原有門部。而作志者，則因門為題，就事立誌，謂之籤題……，但誌其門名，而必藉按策以見其事……。向使無策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遷滅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¹⁵

毛氏認為春秋史官系統中的「簡書」，乃「門部」、「籤題」之名，不含具體事件內容；「策書」方具備事之始末詳略。他甚至指出「簡策之例必具三事，一讀本國、一上之王朝、一告知四方邦國諸侯」，並統整「舊史官記事法式二十二

¹³ 謹案：提出《春秋》經、傳有「策、簡」之別，其實非始自毛奇齡。宋代魏了翁（1178-1237）《春秋左傳要義》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修定悉因正策之文」、「經文依史官策書，……傳文采於簡牘」已有類似概念。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首，頁261；卷5，頁307-308；卷28，頁507。魏了翁與毛奇齡皆根據杜預「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立說，但二者對「大事、小事」的詮釋有異。毛奇齡《春秋毛氏傳》認為「大小」指字之「多少」：「春秋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簡所容，祇一行字耳。……若策，則所容者廣。故聘禮曰：『百名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簡』，而鄭氏註云：『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故杜氏《春秋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正言春秋經事之多字者，必書于策，文載事煩，故策書之；事之少字者，可書簡牘，經文祇題目，即簡牘而書已盡。其云大小者，多少之謂，北人稱多少曰大小故也。」毛氏將「大事」理解為「事之多字」，「小事」為「事之少字」，即標題精省的經文。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76冊，卷8，頁84。魏了翁則認為「大小」關乎事件重要程度：經之地位高於傳，為大事，為史官策書；傳則為簡牘，故其「經傳」與「簡策」之對應與毛氏相反。

¹⁴ 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卷1，頁6-7。引文底線為筆者標記用以強調，下文同。

¹⁵ 同前引，頁7-8。

門」，¹⁶ 頗有還原舊史制度之意。《春秋簡書刊誤》又言「策書、簡書」系統唯《左傳》保存：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先儒目之為「簡書」，即聖經也。……第其書不知亡于何時。唯三傳傳經，則各有經文載于其中。……顧兩家〔案：指《公》、《穀》〕杜撰，目不見策書，徒以意解經，故經多誤字。而《公羊》且復以里音市語，譌謬其間，其所存聖經已非舊矣。及《左傳》行世，則始知有簡書正文冠策書首。¹⁷

毛說相當特別，若以寫本角度觀之，所謂策簡有別、「簡書正文冠策書首」者，已近乎對書寫形制的描述，也指向物質載體因應文書行政而產生的區別；羅列二十二「門目／籤題」，則是對文本視覺型態的設想。

暫不論毛氏對「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兩句話的解讀是否正確，所謂「一讀一上一告」、「門部名目」等有關春秋史官記事之法，雖然合理，但在所據僅有「傳刻之書」的情況下，這些有關書寫形制、視覺型態的論述，終究只是設想，無怪四庫館臣批評其「武斷」。¹⁸ 不過，現今戰國秦漢簡牘出土後，則確實可見到某些行政文書有類似現象。在包山楚簡所出一批文書簡中，有一批題為〈疋獄〉、〈受期〉的刑獄文件，可見到當時官吏以一簡紀錄一案件，〈疋獄〉為案件概要，〈受期〉為決行時間；值得注意的是，還有若干「簽牌」，可能是總括整批文書的名稱。¹⁹ 文書簡的出土，或能支持毛氏對春秋記史所謂「門部名目」、「籤題」的想法，但戰國楚簡與「魯春秋」，有多大程度的相通，則尚待考慮。

毛氏假想《春秋》經、傳來源於不同的記事系統，則其所欲復原的，不只是「聖經」之舊，其實也是古史制度之舊。此種遠大的意圖，當然很難達成。但他在此理念下，考辨《春秋》經之異文，以《左》經為主而辨正《公》、《穀》，澄清「誤字」與「里音市語」，在有關文字方面（即上述寫本研究所謂「書寫」），仍屬有功，展現了他惋惜「聖經已非舊」，並意圖復原經書舊貌的努力。

段玉裁 (1735-1815) 以復原「春秋左氏古經」為目標。其《春秋左氏古經·提

¹⁶ 同前引，頁 7。

¹⁷ 毛奇齡，《春秋簡書刊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176 冊，卷 1，頁 11。

¹⁸ 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提要〉，頁 4。

¹⁹ 相關研究參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頁 21-50。感謝審查人提供此項材料。

辭》曰：

蓋三家各自為經。《漢志》言「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經也。又言「經十一卷」，自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者，謂二家之經皆十一卷，與古經不同也。……古曰篇，今日卷。竹木曰篇，縑素曰卷。三家經卷數不同，而經傳各為書。杜氏預乃取《左》經分年冠於某年傳首。二家則漢以後學者析經文冠某事之首，而無傳者依次附焉。於是三家之專經均不可得見。宋時有《春秋正經》十二卷，梅山李燾仁甫又令潼川謝疇元錫成《春秋古經》十二篇，今皆亡矣。

……乃恭錄左氏經文，取鄭公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羊》、《穀梁》經文之異。……仍依《漢志》署曰「春秋左氏古經」。²⁰

所謂「古經」者，即《漢書·藝文志》載錄：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一卷。

《穀梁傳》十一卷。²¹

段氏談及「竹木曰篇，縑素曰卷」等不同物質載體，實即指出《左傳》與《公》、《穀》所傳之經，在「形制」層面上為不同材質；又談及三家經、傳各自編輯的時間、方式，指向其文本編次排序的「視覺型態」之異。而翻閱《春秋左氏古經》，確實可見其依循上述《漢志》的紀錄，將經文分為十二篇；²² 篇中經文每事獨立一行、不連書，後不附傳文（書影參附圖一）。由此可見，段氏不只重視對「古

²⁰ 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收入嚴一萍主編，《百部叢書集成》第 1082 冊（新北：藝文印書館，1968，景清光緒鮑廷爵校刊《後知不足齋叢書》所收經韻樓原刻本），頁 1-2。

²¹ 王先謙，《漢書補注》（臺北：新文豐出版，1988），卷 30，頁 15。各家說解彙整與討論可參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頁 60-61。

²² 亦即以年數最少的閔公獨立成篇。《春秋左氏古經·四篇》末，段氏曰：「二家經十一卷者，何邵公發其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是也。《公》、《穀》傳本皆十一卷，《公羊》唐石經及鄂州本，僖公第五之下注之曰『卷四』，文公第六之下注之曰『卷五』，以至於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存何氏之舊也。」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頁 30。

經」的文字考訂，²³ 對文本型態也有所措意，尤重視經文獨立之形制，故透過著作中的實際編排，有意恢復漢時故書之貌。

上述毛、段二人對「文本型態」的復古取徑不同，前者涉及史官文書制度，後者則致力重現《漢志》所錄「古經」的樣貌。二人也有相同處：一、皆以《左傳》所存之「經」為最古；二、皆指出「古本」之所以不存，與杜預「取《左》經分年冠於某年傳」有關。這兩個看法，也是清儒的普遍認識，其他於文本型態有所措意的學者，基本也持相同觀點。以下再略舉二例。

洪亮吉 (1746-1809)《春秋左傳詁·序》自言其書編次：

分經為四卷，傳為十六卷，遵《漢·藝文志》例也。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為主。……欲存《春秋左傳》之古學耳。²⁴

洪氏在訓詁上尊漢，其書編次亦「遵《漢·藝文志》」，採經、傳分行，蓋為體現漢儒舊注的文本脈絡。相較於前二者，洪氏所欲「復古」的對象，不僅《春秋》經，也涉及《左傳》；其書以經、傳分行，展現了他對漢代文本型態的認識，也表現他不滿杜預「分傳附經」之舉。只不過，洪氏分「經為四卷，傳為十六卷」，實未對應《漢志》所錄卷次，相比之下，前述段玉裁著作才更貼近所謂的「古經」。整體來說，洪氏在蒐錄舊注方面，實於《春秋左傳》古學有益，但經、傳分行之舉，則流於形式。

侯康 (1798-1837)《春秋古經說·序》與段玉裁相似：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並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然大要古經為優，而自漢以來，即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即位為公即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此毛氏

²³ 翻檢歷代相關著作，不時可見稱引「左氏／傳古本」校訂經文字句者，如宋代張洽 (1161-1237)《張氏春秋集注》、陳深 (1293-1362)《讀春秋編》，元代程端學 (1280-1336)《春秋本義》、李廉 (生卒年不詳)《春秋會通》，清代惠棟 (1697-1758)《惠氏春秋左傳補註》、焦袁熹 (1660-1730)《春秋闕如編》、葉西 (?-1754)《春秋究遺》等皆有相關論述，惟多屬零星提及，仍以段玉裁之作最為全面。

²⁴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頁2。

《春秋簡書刊誤》、段氏《左氏古經》所由述。²⁵

侯氏立論呼應毛、段，聚焦《左傳》所保留之「春秋古經」，亦以「《左》經」近古為優，似頗涉及古書之形制與視覺型態兩層；但其實際建樹，則仍在於《春秋》經的異文考辨，以《左》經為本，並取《公》、《穀》與其他漢人舊注參校，疏通證明，這與其他從事異文考辨的著作如趙坦（1765-1828）《春秋異文箋》、李富孫（1764-1844）《春秋左傳異文釋》、臧恭壽（1788-?）《春秋左氏古義》，可謂名異而實同。

（二）恢復《左傳》古本：翁方綱、俞樾的主張及其意義

上述毛奇齡、段玉裁等學者的文本型態復古，或設想春秋記史之制度，或希冀恢復「古經」文字與經傳別行之樣貌。然而種種嘗試或假設，受到證據面的限制，只能說是合理的設想，其實際建樹，仍在「書寫」層面的異文考辨。

而在這些「復古」論述中，尚有一較少為人注意的研究進徑，既不從事文字考辨，也不涉及《春秋》古經，唯特重恢復「《左傳》古本」的「視覺型態」，此即翁方綱（1733-1818）《（春秋）分年系傳表》²⁶與俞樾（1821-1907）《左傳古本分年考》。

翁、俞二人時代無交集，卻皆從「分年」切入，意圖復原《左傳》尚未「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的面貌。所謂「分年」者，翁方綱《分年系傳表·序》云：

杜氏〈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蓋古者《經》、《傳》各為卷，自杜氏始取《傳》文分系於《經》文下，以便讀者。此視後之讀《易》者分《象傳》於爻辭下，意雖同而例微異。《易象傳》分屬爻下，必逐條增「象曰」字以隔之，《春秋傳》則無此也。無一字之增，但分附以便讀者，何害乎？然亦有所不可者，或《傳》文未終而以

²⁵ 侯康，《春秋古經說》，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66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1。

²⁶ 翁方綱，《春秋分年系傳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三年博古齋影印本）。另據翁氏手稿本觀之，此書原名《春秋分年系傳表》，後塗去「春秋」二字，則當稱《春秋附記·卷第六·分年系傳表》，下文引用即稱《分年系傳表》。翁方綱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第5種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春秋附記》，卷6，頁407。

《經》文橫截之，是其失又甚於分《象傳》者矣。²⁷

「《傳》文末終而以《經》文橫截之」，指的是在《左傳》中，一事件前半部分之敘述繫於「某年之尾」，而事件的後半展開於「下一年之首」。典型的例子如文公八、九年《左傳》，文八年末《傳》文：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卷 19 上，頁 320）

此年說明先克與梁益耳、蒯得等人的舊怨。文九年《左傳》接續曰：

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卷 19 上，頁 321）

就時序言，夷之蒐實發生在文六年而非八年，故該段傳文完全沒有必要置於八年之末。就內容言，二條傳文敘事明顯連貫，九年「使賊殺先克」一句省略主事者，則必與上年「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併觀，方能脈絡順暢。《分年系傳表》所重正是此類文本現象。翁氏認為，當「《經》、《傳》各為卷」時，像上舉文八年、九年之事，自當一氣直敘、不應分段；而在分《傳》附《經》後，方因人為分割，造成一事分屬兩年，故他批評杜預在此類傳文下注「張本」之語乃畫蛇添足：

杜氏知其為後傳張本，而不知其即是後傳之文也。知其即為後傳之文，而無所庸其張本之云矣。亦有必系於前一年者，則注云「為後傳張本」，宜也。今以本應連在後者而隔之使居前，乃增多一「張本」之語，可乎？²⁸

並列舉了 23 則「本應連在後者而隔之使居前」的例子。

²⁷ 翁方綱，《分年系傳表》，頁 1a。

²⁸ 同前引，頁 14a。

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與翁方綱思路極似，其序曰：

凡作傳之例，每年必冠以年，每月必冠以月，此紀事之定例也。然事必有其緣起，不能一例冠以年月。如〔案：隱公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五父如鄭雖在十二月，而其事不始於十二月，故於「十二月」之前，先書「陳及鄭平」也。……如此之類，學者皆以為當然，未嘗謂每篇必當從其月起，而某月之前不容著一字也。夫年之與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礙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今一一正之，以存左氏古本之舊。²⁹

又曰：

凡《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為篇，以上諸條，皆牽連為文，初無間隔。至後人合傳於經，乃始有經文間隔其中，而又編次失當，每年必以年建首，年以前所有文字一一割歸上年之末，於是文義多不可通。³⁰

所言與翁氏大意相同，但俞樾似未見翁書，不僅沒有提及，其所舉例與翁氏也互有異同，二者共計提出 35 則「分年」事例。³¹

翁方綱《分年系傳表》在當世似未獲太多關注，研究者往往在翁氏「反對杜注」的概念下提及此書；³² 而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相較於其《群經平議》的成就，也相對不顯。但就近世《左傳》學史的發展言，其特色與影響仍值得關注。從優點或特色言，翁、俞與前述學者的研究材料基礎並無不同，而他們在沒有真正「古本」可參考的情況下，憑藉史事跨年度連貫為理據，由是推想「古本」篇次之分段。《左傳》以史事解經，本是其特色所在，而對「敘事連貫」特性的關注，就清代《左傳》學來說也不陌生，諸如各類《左傳》「紀事本末」的著作，³³ 都可

²⁹ 俞樾，《春在堂全書》第 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曲園雜纂》，卷 14，《《左傳》古本分年考》，頁 115。此說又見於：同前引，第 1 冊，《群經平議》，卷 26，頁 427-428。

³⁰ 同前引，第 3 冊，《曲園雜纂》，卷 14，《《左傳》古本分年考》，頁 118。

³¹ 相關統計可參蔡瑩瑩，〈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臺大中文學報》，81（臺北：2023），頁 1-70。

³² 參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第 6 章，頁 200-215。

³³ 諸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馬驥《左傳事緯》、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等，都是學者耳熟能

是重「事」的表現；翁、俞的洞見則在由「敘事」開展出對「《左傳》古本」的思考，儘管例證不多，但二人確實建立了合理的推論，也引出《左傳》文本的編纂議題。

不過，從缺點來說，翁方綱、俞樾延續清儒對杜預的不滿，對於杜《注》「張本」的批評不免過度。另外，他們著眼於「經傳分行」的文本型態，本意在求真、求古，但當其強調「《左傳》古本」有「前後連文」、以「事」為主的連貫性，又批評杜預「以經文間隔其中」時，不免略有將「經文」暫時排除在《左傳》敘事脈絡外的隱憂。³⁴ 我們必須釐清：敘事的連貫與否，不能作為決定《左傳》「古本」原貌的唯一指標，否則很可能會導向如下節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對《左傳》的「分解」。

綜觀上述清儒對《春秋》古經的求索，乃至對《左傳》古本的復原，我們可觀察到，毛奇齡、段玉裁等學者，在著作中都清楚提及古書流傳千年所可能經歷的文本型態與物質載體之改變，也因此希望恢復「古經」。而其研究成果主要仍以傳世文獻為範圍，就《春秋》經文進行書寫層面的文字考訂。翁方綱、俞樾則重視《左傳》的文本編排，提出其有可能遭到後人誤分，產生段落錯置；其純就史事的連貫性立論，可說更凸顯了《左傳》歷史敘事的特色。在清儒輯佚舊注以求「古義」，冀望「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學術主流之外，上述這些顧及「文本型態」的復古，可謂一道清淺的伏流。

三、近代有關《左傳》「編纂」的討論

前述翁方綱、俞樾對「《左傳》古本」的復原，本意在追尋「古本」，其特色乃從《左傳》「敘史連貫」性著手，指出了事件為經文所隔的現象。翁、俞區辨「春秋經文」、「左傳敘事」為二，就恢復古書的文本型態言，並無不可；但也相對容易忽略「敘史」與「經義」的關聯。更有甚者，若因此不承認二者間具有意義闡釋關係時，登場的便是「分解《左傳》」³⁵ 的劉逢祿。

詳的著作。

³⁴ 當然，此處僅就此二部著作表現出的文本認識而言，並非翁方綱、俞樾的學術主張不重視經傳關係。

³⁵ 語出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殷曆譜序〉，頁364-369，引文見頁368。

(一)從經書到史料：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舊文說

劉逢祿 (1776-1829)《左氏春秋考證》主張《左氏》非依附《春秋》經之「傳」，乃獨立成書之「史」：

《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太史公所據舊名也。

左氏後於聖人，未能盡見列國寶書，又未聞口授微言大義，惟取所見載籍如晉《乘》、楚《檮杌》等相錯編年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經，故往往比年闕事。劉歆強以為傳《春秋》，或緣經飾說，或緣左氏本文前後事，或兼采他書以實其年。³⁶

劉氏強調「《左氏》舊文」存乎《史記》，今本則已遭劉歆竄亂比附。故《考證》時時強調某些敘述「當非舊文」或「乃真舊文」。如：

莊廿七年「晉侯將伐虢」：

此年《左氏》文闕，每於年終分析晉事，增益之跡甚明。蓋《左氏》舊文之體，……本不必拘拘比附《春秋》年月，自歆改竄而舊文遂亂。

文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此篇〈宋世家〉及〈年表〉俱不載，當非舊文。

襄廿七年「書先晉，晉有信也」：

晉，中國之伯，屈建即不以詐而得主盟，夫子何忍與之？固知《左氏》不必比附處，乃真舊文也。³⁷

劉氏或由事件不繫經之年月、或因《史記》未載，又或因所記盟主位次不同，從而論《左氏》「舊文」與《春秋》無涉。

劉逢祿之所以分辨「舊文」，主要出自其獨尊《公羊》的立場。他批評《左氏》不傳《春秋》，種種解經語，乃出自後人之手；由此推導出《左傳》中「不解

³⁶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收入阮元輯，《皇清經解》，《廣州大典》第15輯經部總類第21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1829）廣東學海堂刻咸豐十年（1860）補刻本影印），卷1294，頁200、203。

³⁷ 同前引，頁203-204、206、207。

經」者，方是「真舊文」。但是，有關《左傳》不解經之爭議，並非始自劉氏，正如張西堂在〈左氏春秋考證序〉中提到劉敞、徐庭垣、葉夢得、程端學等更早期的學者，已有相似辨析。³⁸ 劉氏主張「《左氏》舊文」的特色，實乃從史書編纂切入：其方法與前述翁方綱、俞樾類似，根據「以事為篇」的原則，連繫前後文而復其「舊」，如下列數條：

1. 桓十一年：

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案：該年《傳》文「楚屈瑕將盟貳、軫。」〕

2. 桓十二年：

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案：該年《傳》文「楚伐絞，軍其南門。」〕

3. 桓十三年：

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案：該年《傳》文「春，楚屈瑕伐羅。」〕

4. 莊元一七年：

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荊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攷。或舊文，與前伐羅篇相次。〔案：荊尸篇指四年《傳》文「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伐申篇指六年《傳》文：「楚文王伐申。過鄧。」〕³⁹

第1至3條為楚莫敖屈瑕伐絞、伐羅事，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也列為「牽連為文，初無間隔」的例子。劉氏分別稱為「屈瑕篇」、「伐絞篇」、「伐羅篇」，指出其共同點是「年月無考」且性質密切相關，本應「相接相次」，不當「比附春秋」。尤其第4條的時間，實與前三條相距頗遠，但劉氏仍主張當與前文相接，隱然有以國別為史的傾向。換言之，若將此數篇「恢復」為所謂「舊文」樣貌，會得到一無經文間隔、以楚事為主的「楚伐絞、羅、隨、申」紀事，這與前述翁方綱、俞樾探究《左傳》史事之「分年」形式，可謂形極似而神有異：翁、俞僅僅指出

³⁸ 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第5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頁153-170。又關於劉氏論證「左氏春秋」的方法與辨析，見林慶彰，《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辨偽方法〉，頁403-430。

³⁹ 以上引文見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卷1294，頁203。《左傳》原文見《春秋左傳注疏》（卷7，頁122、124-125；卷8，頁140、141-142）。

《左氏》「經、傳分行」的古本型態，本意是不欲經文「間隔」傳文敘事之流暢，並未否認經傳間的詮釋關係；劉逢祿卻儼然宣稱經、史殊途，欲「以《春秋》還之《春秋》，以《左氏》還之《左氏》」，⁴⁰乃分解《左傳》，欲在拆解廓清的史料斷垣中重建「左氏春秋」之「史書」定位，進而保證《公羊》「經」說之獨尊。

若說清儒對《春秋》、《左傳》的復古思維，大抵乃由內而外：追索舊注古訓的內容意義，進而嘗試復其形制之古，故其著作或用心於呈現「經傳分行」之文本型態。那麼我們可以反過來形容劉氏《考證》的理路，乃由外而內：從文本型態著手，分裂《春秋》、《左氏》為二，遂論斷二者在內容義理上亦無關聯。綜觀劉氏恢復「《左氏》舊文」的兩個方法：一、以解經與否為判，不傳《春秋》者，方為舊文，並且將其性質目為獨立史書，與經無涉，較諸前代學者，無疑更加極端。二、由敘事之相接相次，試圖復原某一敘事未曾間隔的舊文，並推論其源自不同史料；此則開啟了後來學者「史料編纂」角度的思考。正如傅斯年（1896-1950）所言：

清乾嘉考證學之盛，初以為有功乎論贊六藝，其實富於破壞性。自劉逢祿分解《左傳》，至今而辨經籍中之古史資料者多矣。⁴¹

從乾嘉考證學到劉逢祿「分解《左傳》」，其間隱微的連繫與所謂「破壞性」，關鍵正在「辨經籍中之古史資料」一語，隱含將「史事」從「經書」抽離之意：劉逢祿雖是為推尊《公羊》家之今文經學，但其手段卻是將《左傳》劃入類似《國語》的國別史範疇，他分辨「舊文」與「改竄比附」，實即主張《左傳》中，存在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文本材料，而若我們根據《考證》一書所標舉之「《左氏》舊文」進行復原，將只會得到泰半殘缺而體例則類似《國語》的零星「史料」片段。

劉逢祿觀點雖偏激，但他揭起史料考辨之一端，在民初疑古學風以及「新史學」、「科學的史學」⁴²的呼籲興起後，終以一髮而動全身。今文學／古史辨的

⁴⁰ 劉逢祿，《鍼膏肓評》，收入阮元輯，《皇清經解》，《廣州大典》第15輯經部總類第21冊，卷1296，頁222。

⁴¹ 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第3集，〈殷曆譜序〉，頁364-369。

⁴² 有關新史學的興起，先涉及西方史學理論本身的變革，後因梁啟超引進，建立起「史學就是史料學」、「科學的東方學」此一強調史學之科學性、史料價值的路線。相關研究參考楊肅獻，〈歷史懷疑論、古物研究與近代歐洲史學的起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4（臺北：2020），頁129-186；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06），〈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頁229-260。

代表學者如康有為 (1858-1927)、顧頡剛 (1893-1980)、錢玄同 (1887-1939) 等，⁴³ 皆推崇劉氏《考證》，錢玄同提出更激烈之說法：

咱們對於一切古書都只認為一種可供參考的史料而已。……決不願奉某書為唯一可信據的寶典。⁴⁴

古史辨學者講求考信「史料」，一旦六經中有他們認定「非信史」的材料時，便拒不承認經典的價值。⁴⁵ 如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就拒絕承認傳統的「正史」，直言在沒有辨析清楚史料真偽前，「真正的歷史」還不存在。⁴⁶ 又如楊向奎將史料比喻為「建築材料」，認為當先計較材料之朽蝕，否則一切論述與認識，都不過是空中樓閣。⁴⁷

古史辨學者意圖解消《春秋》、《左傳》的經典性，方法是貶抑其「史料」價值，如將《春秋》指為「幼稚的歷史」，⁴⁸ 對《左傳》的性質認定，則贊同劉逢祿之說，且實質上特重「劉歆作偽」一議，對劉氏尚且討論一二的「左氏舊文」面目，幾無措意。如顧頡剛曾論「《左傳》對原本《左氏》書之改造」，其中一項是「本為一時事，而分插入數年之中者」，舉證僅用《考證》提過的「曲沃併晉」與「楚伐巴、隨、絞、羅」二例，⁴⁹ 可說相當薄弱。其實上述翁、俞著作的 35 則「分年」都是可討論的材料，顧文均未提及，正是因為在破除經典權威的概念下，《左氏》連「史書」地位都尚且不穩，更接近於「史料」，遑論其「古本／舊文」

⁴³ 相關論述參考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顧頡剛講授，劉起釭筆記，《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88），〈後記——兼述春秋左傳學之流變遞嬗〉，頁 108-134；陳其泰，《春秋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⁴⁴ 錢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收入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第 1 冊，頁 231。

⁴⁵ 此一理念在顧頡剛與錢玄同「論辨偽叢刊」、「論古史」等來往書信中反覆提及，詳參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同前引，頁 75-80、81-89。

⁴⁶ 同前引，頁 203-212。此外他也指出顧、錢與柳詒徵的《說文》爭論乃是「史學方法論」問題，並批評柳氏「處置史料的方法不對」。同前引，頁 206。

⁴⁷ 楊向奎，〈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書後〉，收入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第 7 冊，頁 552-553。

⁴⁸ 相關論述見於錢玄同與顧頡剛〈論春秋性質書〉與〈答書〉。同前引，第 1 冊，頁 225、227-228。案：古史辨學者對所謂經典權威的打破，往往從「經傳分離」著手：先讓「傳」與「經」脫鉤，此舉能消滅「傳」文的經典性；進而懷疑傳文為偽造，最終連經書性質也會懷疑，或者同樣將其目為「史料」。這並非《春秋》、《左傳》獨有的現象，對《周易》的論述也是如此，鄭古雄論之甚詳，參鄭古雄，《周易鄭解》（新北：聯經出版，2023），〈論二十世紀初《周易》「經傳分離」說的形成〉，頁 453-492。

⁴⁹ 顧頡剛講授，《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頁 59-83。

面貌如何了。

當然，考察《左傳》之「材料」與「編纂」，單純作為研究方法，不必然指向劉逢祿或古史辨學者「遍疑群書」的結果。只要能論證材料為「真」，則《左傳》的性質在「經」與「史」二端，或許就不至於矛盾衝突。楊向奎（1910-2000）〈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對《左傳》「古本」的論述，就表現既追尋《左傳》古本而又分析其中「史料」的融合路線。此文第一節「論書法及解經語」，一方面主張書法與解經語非「後人竄加」，但另一方面又認為「亦非即謂《春秋》有如此書法也」、「三傳之書法義例亦皆只是其本身所有義」。第二節論「凡例」者，則認為凡例乃「《左傳》編者同時流行之禮論」，未必有人「本之實行」或「本之修史」。⁵⁰ 又言：

前人有因《左傳》書法有乖忤處，而疑其偽者，然乖忤與偽竄固不能混為一談。又有因書法、凡例多有截斷上下文之處，疑為後人偽加者，此自有相當之理由。然書法、凡例與《左傳》記事，固非同一來源。蓋《左傳》記事本與各國策書舊文，《左氏》作者取而編裁，再加入當時之禮俗禁忌等以成其所謂書法、凡例者，……以《左傳》來源非一，故有不相協之處。⁵¹

「書法、凡例與《左傳》記事，固非同一來源」，即是對史料來源的識別，只不過楊氏強調「名為《左氏春秋》亦不害其傳經之事實」。⁵² 楊氏特意辨析前人之說，概意識到自己區辨「解經」、「記事」兩種材料，乍看與劉逢祿或古史辨學者的主張相似；但不同的是，他堅持《左傳》的經學價值，對《左傳》內容「來源非一」的論述，僅就「史料查證」一面表示贊同。但「不同來源」不代表必定有「假」，故楊氏〈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略論五十凡〉、〈論左傳「君子曰」〉等文，耗費大量篇幅心力，逐一檢索《左傳》與其他古書互證，得出《左傳》雖有不同來源的材料，但皆是作者取而編裁，沒有後世加工之跡，以證其真，可謂運用史學方法而積極詮解經學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楊氏專立「《左傳》古本說」一節：

⁵⁰ 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174-214，引文見頁 188、191。

⁵¹ 同前引，頁 189。

⁵² 同前引，頁 213。

終漢之世，《經》、《傳》別行，至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而因之乃有一事隔為兩年者，致使辭意不接，形式乖忤。若《經》與《傳》別行，則前後相接，此弊可免。然分《傳》解《經》者，如能打破每年冠年、每月冠月之例，而以事為主，年月之上不礙有字，離碎之弊亦可免。余前曾作此工作，即以不同年月事實相接之文字抄出，以求《左傳》古本之面目，後見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一文，與余之工作，不謀而合。⁵³

他自謂與俞樾「不謀而合」者，實則草蛇灰線，伏脈可循。楊向奎雖為顧頡剛的學生，但如上所述，其治《左傳》，始終力證其不偽，對於劉逢祿與古史辨派傾向今文經學的立場，頗有不同意見。⁵⁴ 若然，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不否認經傳關係，而復原經傳別行的文本型態，也就與楊向奎重視「史料」但持守《左氏》傳經之說的態度相契。

從清代學者「回向原典」精神蔓衍出恢復「古經／舊文」的文本型態復古，到翁方綱、俞樾從「分年」著手探究《左傳》古本舊貌，再到劉逢祿離析經史、分解《左傳》，乃至古史辨學者指控「劉歆偽纂」的歷程，傅斯年「辨經籍中之古史資料」堪稱一語中的，點出了「經書」與「史料」之間日漸鮮明的差異與分立。而隨著古史辨風潮暫歇，近代除少數學者外，⁵⁵ 研究者多不再信從劉歆偽竄之論。但是，對「左氏舊文」或「史料」的關注，則仍持續討論。換言之，當學者眼光專注在恢復「舊」文本型態時，自然會衍伸出探究經典文獻之「取材」與「編纂過程」的進路。持此略帶「分解」意味的眼光看待經典，辨析其中哪些素材較「古」、又哪些「史料」為真、文獻「舊貌」為何時，實則指出了一「新」的史學研究進路：

⁵³ 同前引，頁 200。

⁵⁴ 楊向奎，《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論古史辨派〉，頁 11-35。有關楊向奎與古史辨、今文學派之關係頗為複雜，非小文之篇幅與議題可道盡。相關研究述評參考王學典、李梅、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車行健，〈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政大中文學報》，21（臺北：2014），頁 59-96。

⁵⁵ 感謝審查意見補充，姚曼波《〈春秋〉考論》分辨「敘事」與「解經語」性質之異，主張《春秋經》是公羊家、穀梁家所傳，提出「孔子《春秋》」是今日所見《左傳》的「祖本」，今日的《左傳》則是「在孔子《春秋》的基礎上加入講解《春秋經》的內容而成」。姚曼波，《〈春秋〉考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102。徐仁甫《左傳疏證》力主「劉歆作《左傳》」說，並詳細列舉《左傳》內容採自《國語》的例證及其規律，亦論及採諸子《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材料者。這些論點與劉逢祿亦頗相似。徐仁甫，《左傳疏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進行史料或史實的性質考辨，探究其編纂、傳播過程。如此一來，《左傳》研究議題，一定程度上便由經學朝史學轉軌。⁵⁶

(二)《左傳》編纂與材料來源研究在西方的接受

當《左傳》研究逐漸轉向重視「史」之一面，史料來源與編纂方式的考察，就成為新的關注點。趙光賢〈左傳編纂考〉及其學生王和〈《左傳》材料來源考〉、〈《左傳》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可為代表；⁵⁷ 由諸文題目即可見出史料編纂的研究路線。

陳銘煌《春秋三傳性質之研究及其義例方法之商榷》曾述評趙光賢（1910-2003）〈左傳編纂考〉的研究，指其與劉逢祿持論大同小異：

近年來有些比較嚴謹的學者，認為左氏春秋是一部真史書，原非傳經而作，其書法凡例等解經語乃由後人附益。他們的基本觀點實與劉逢祿差不多，只差不同意偽竄者為劉歆而已。

……包括趙氏〔案：即趙光賢〕在內的晚近一派學者，他們對於左傳的態度，基本看法接近劉逢祿（主張左傳不解經，本為純記事的「左氏春秋」；解經部分乃後人附益，但不必出於劉歆之手），而有比較理性的分析論證，所以頗得學界肯定。⁵⁸

陳氏稱此類研究嚴謹、理性，但除趙光賢之外，未提出其他學者。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曾言胡念貽（1924-1982）持論與趙氏相同，並批評此類說法只是為了強調《左氏》敘事獨立，假立一難以驗證存在與否的「歷史雜著」。⁵⁹

⁵⁶ 相關論述參考《春秋左傳學史稿》第十二章對古史辨學者之述評。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 356-399。王汎森、路新生則分別從個案分析與宏觀角度，論述「經史轉軌」在清末民初的整體學術發展方向。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究》，2（北京：2005），頁 59-74；路新生，《經學的蛻變與史學的「轉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⁵⁷ 趙光賢，《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中心，1987），頁 136-187；王和，《左傳探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第 6、7 章，頁 65-85、86-104。

⁵⁸ 陳銘煌，《春秋三傳性質之研究及其義例方法之商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 65、78。

⁵⁹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 373-382。胡念貽認為：「《左傳》本來是一部敘事較強的史書，……它並不是為解釋《春秋》而作。它獨立於《春秋》之外。後來有人陸續竄入了一些解釋《春秋》的文字，……如果全數刪去，絲毫不影響《左傳》敘事的完整性。」胡念貽，《中

就趙光賢〈左傳編纂考〉言，其前二節依次為：《春秋》、《左傳》為各自獨立的書；《左傳》分「記事」和「解經」兩部分。⁶⁰ 這些主張都與劉逢祿極相似。此外，在分辨哪些部分屬《左傳》原始紀錄／舊文的方法上，趙、劉亦有所會通，〈左傳編纂考〉論及「《左傳》的編纂及其年代」曰：

《左傳》記事中往往有這種情況，在一大段記事中全無日月，中間突然有一段日月非常分明，文體迥然不同。……這類記事的特點是：文句簡短，月日明確，沒有鋪敘描寫。這是當時史官記事的體裁，是原始紀錄，時間最早，也最可信。⁶¹

以「日月」詳盡與否作為「原始紀錄」之判準，也令我們聯想到劉逢祿曾以「年月無考」作為「舊文」痕跡。兩者都注意到：《左傳》內容存在多種紀錄方式或記史／記時體例的差異，只不過趙光賢強調「月日明確」者為史官原始紀錄，劉逢祿則提出「年月無考」者來自楚《檇杌》等史籍，不必遵魯《春秋》之紀年。這體現出二人對古代史書的設想不一：趙氏認為《左傳》材料源自史官，故年月俱全；劉氏則稱《左氏》體例類似《國語》，不記年月。

王和〈《左傳》材料來源考〉服膺師說並加以發揮，將《左傳》的材料來源，分析為三類：「正式國史」、「各國史官的私人記事筆記」與「傳聞傳說」。「正式國史」的特徵是「記事簡略、規矩嚴格、用語專門」，即魯《春秋》一類的正式檔案。「史官筆記」再分為「事件當下的即時記錄」、「事後追記」、「有意編造的故事」三種；其中又以史官的「即時記錄」史料價值最高，王氏並與趙光賢相同，標舉「日月詳盡」為此種紀錄的特徵。至於所謂「傳聞傳說」則相當於長篇的語類文獻。⁶²

國古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左傳》的真偽和寫作時代之考辨〉，頁 25-26。此議與趙光賢相似。另外趙光賢曾反駁沈玉成對己說的評論，強調自己「否定劉歆偽造說」並與劉逢祿到顧頡剛一系列說法毫無關聯。見趙光賢，《亡尤室文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左傳》和《春秋》是什麼關係——評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第十二章〉，頁 100-104。

⁶⁰ 趙氏在《孔學新論》中甚至直接重複劉逢祿的主張曰：「《左傳》原書本名《左氏春秋》，是採集各國史書而成的書，完全是記事的。」趙光賢，《孔學新論》（成都：巴蜀書社，1992），頁 100。

⁶¹ 趙光賢，《古史考辨》，頁 180-181。

⁶² 王和，《左傳探源》，頁 73-77。

至於三類「材料來源」如何構成《左傳》？王氏認為《左傳》作者：

搜集了散失在民間的各國史書，又盡可能地參閱了其他各種可以見到的書籍典冊，然後從中摭摭出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材料，……再加上流傳於當時的有關春秋史事的各類傳聞傳說，把他們分門別類歸納在一起，採用紀事體的形式，整理編輯成一部內容豐富的史事彙編，這就是最初的《左傳》。……由於《左傳》的體裁是紀事體，查找起來很不方便，以後經師們就索性按照《春秋》的體裁，將《左傳》改編為按年編排的編年體。……在此之後，《左傳》就逐漸被人們看作是解「經」之「傳」，其本來面目則慢慢不為人所知。⁶³

這段對「編纂過程」的敘述，幾乎形同劉逢祿《考證》的「白話翻譯」。只不過王氏和趙光賢一樣，不採信「劉歆篡偽」說，故認為這一「史事彙編」內容豐富；劉氏因主張後世竄亂，故其所謂的《左氏春秋》，多有闕文。整體來說，王和對《左傳》材料來源的分類較趙光賢更細緻，也更凸顯《左傳》包含各種異質史料，甚至逐一分析可能來自鄭、晉、魯、齊、周、楚、宋、衛的史源。從《左傳》的編纂議題看，王氏可謂與劉逢祿暗合；然從性質認定言，則王氏強調這些史料來源之可信，而遂與西方《左傳》研究接軌（詳下）。

就筆者觀察，王和的研究在臺灣中文學界尠少引用，在中國則影響力較大。⁶⁴不過若考量中國學界自身的研究路線，以先秦領域來說，在 90 年代開始「走出疑古」、「對古書二次反思」等風潮下，王氏的研究也不屬熱點。原因除了持論並未超越師說之外，恐怕還是因為中文學界關於《左傳》性質的討論，在古史辨風潮告終後，就已基本定調，加以出土文獻研究大盛，個別傳世文獻的編纂議題不再是討論焦點。⁶⁵

⁶³ 同前引，〈《左傳》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頁 103。

⁶⁴ 舉例而言，臺灣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資料庫中，博碩士論文參考書目中列有王和〈《左傳》材料來源考〉者，截至 2024 年僅 5 篇；〈《左傳》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則有 6 篇。中國方面，檢索「中國知識資源總庫 CNKI」之碩博士「學位論文庫」，則〈《左傳》材料來源考〉的引用次數為 126 次，〈《左傳》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則為 205 次。相關數據僅供參考，不代表筆者對王和及其研究的評價。

⁶⁵ 案：綜合傳世與出土材料，討論先秦古書形成與流傳整體概況的研究，則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也引發了方法論的反思。如謝維揚就曾指出，新出土文獻「提供了以前從不為我們所知的古書成書和流傳情況的某些真實細節，從而能幫助我們合理地判斷與古書成書和流傳過程有關的史料學

但值得注意的是，現今西方漢學家研究早期中國之歷史書寫、出土文獻與《左傳》相關議題者，頗多接受趙、王師徒的論述。如尤銳 (Yuri Pines) 在其重要著作 *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 中，即重點討論《左傳》是否能夠作為探討「春秋時期知識轉化」的可靠史料。他數度引用並贊同王和提出「多種史料彙編」、「史官筆記」的論點，論證《左傳》作為「史書紀錄」，確實能用來討論春秋時代思想背景。⁶⁶ 尤銳對於《左傳》作為可靠史料的意義肯定，又被學者屢次引用，如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有關中國歷史書寫諸章，由史嘉柏 (David Schaberg) 撰寫“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李惠儀撰寫“Pre-Qin Annals”，⁶⁷ 他們均關注《左傳》作為史料是否可信的問題，並徵引了尤銳的研究方法作為參照。另外如馮凱 (Kai Vogelsang) 也引用王和的論點，闡述《左傳》如何「從軼事到史書」之編纂議題。⁶⁸

趙光賢、王和的學說，在兩岸中文學界討論數量實不算太多，甚至若干書評對其學淵源可說所知甚淺。⁶⁹ 但反觀上述西方學者提及《左傳》之成書與文獻性質時，直接或間接採用其說者，都是相當主流且重要的研究，這又是為什麼？

究其原因，筆者以為有二：首先，就研究結果言，趙、王肯定了《左傳》的史料價值，符合西方學者的論述需求。王靖宇〈美國的《左傳》研究〉一文曾將美國《左傳》研究概分二類：第一類將《左傳》作為資料，研究先秦文化、思想、歷史等課題；第二類則以《左傳》本身作為研究對象。⁷⁰ 就前者言，較知名者如許偉

問題。」謝維揚，《古書形成研究與古史史料學問題》（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23），頁18。

⁶⁶ Yuri Pines,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he Chunqiu Perio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peeches in the *Zuo Zhuan* as Sources of Chunqiu Intellectual History,” *Early China*, 22 (1997), pp. 77-132; Yuri Pines, *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hunqiu Period, 722-453 B.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 16. 案：該書引王和約三次，除有關《左傳》基本性質論述外，有關「預言」與成書年代議題，尤銳也都贊同王和的研究方法。

⁶⁷ David Schaberg,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Li Wai-yee, “Pre-Qin Annals,” in Daniel R. Woolf,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94-414, 415-439.

⁶⁸ Kai Vogelsang, “From Anecdote to History: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uozhuan*,” *Oriens Extremus*, 50 (2011), pp. 99-124.

⁶⁹ 如李丹鳳所撰王和《左傳探源》的書評，該文對近代《左傳》學發展似不熟悉，甚至認為王和的「新進展」來自西方史家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1928-2018) 的歷史敘事學，是「傳統史學著作與現代史學理論的一次勇敢碰撞，也是中西學術思想交融的新成果。」李丹鳳，〈沿流溯源：《左傳》文本來源研究的新進展——讀王和先生《左傳探源》〉，《史學月刊》，4（開封：2021），頁119-127，引文見頁126。

⁷⁰ 王靖宇，〈美國的《左傳》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臺北：1993），頁72-80；後

雲《先秦社會史論》、顧立雅 (H. G. Creel)《中國國家治術的起源》等，上述尤銳研究亦屬此類。趙光賢與王和雖與劉逢祿相似，釐析《左傳》中各種不同性質、來源的材料，但不同的是，他們認為這些材料乃「原始紀錄，時間最早，也最可信」，又是「內容豐富的史事彙編」。換句話說，《左傳》中大多數「記事」，都是可信的史料彙編，則正符合第一類研究引用《左傳》的需求。

其次，就研究方法言，趙、王分析了《左傳》的構成要素，切合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上述第二類，即以《左傳》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一方面同樣重視史料考辨，另方面則不循傳統「經學」研究範式，其對《左傳》的問題意識往往是：「《左傳》是如何構成的？」除了前文談及《劍橋中國文學史》與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相關章節有此傾向外，如史嘉柏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分析《左傳》、《國語》的敘事結構與特性，並具體提出“proleptic anecdotes”、“amplifying anecdotes”與“culmination”三種由短篇事例組建長篇史事的類型。⁷¹ 李惠儀《左傳的書寫與解讀》也重視《左傳》內容蘊含的多樣性與「層次」(layers)，指出一事件可能由數則立場、來源互異的材料構成。⁷² 這些研究以分析的眼光看待《左傳》，解析其中蘊藏之「異質」素材或來源。此一研究方法，不禁令我們聯想劉逢祿對《左傳》的「分解」，而趙、王屏除了劉氏偏激的觀點，不牽扯《左氏》與《公羊》的經學論爭，純就《左傳》之「材料」考究其來源性質，論證其多元且可信，建構其編纂過程，對於重視分析史料的西方學者言，自然頗為相契。

進一步言，上述原因，可說都是偏向史學而不涉及經學議題。西方對所謂「經／神聖文本」(scripture) 的觀念，較諸中國毫不遜色，則何以對《左傳》的研究，多偏向史學一路？筆者以為，除了治學風格不同之外，或可從中西漢學交流的特定時機與環境解釋，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大量西方學者直接進入中國執行研究工作與學術考察，是為西方漢學的「專業化階段」；⁷³ 關鍵的是，如前述，此時期《左傳》研究，以內在發展言，本漸由經學向史學轉軌；以外在環境言，正值古史辨風潮與新史學的建立，梁啟超甚至說傳統學科「惟史學」得存。⁷⁴ 那麼，若連

收入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218-229。

⁷¹ David Schaberg,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⁷² 李惠儀著，文韜、許明德譯，《左傳的書寫與解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⁷³ 張西平將西方漢學分為「遊記漢學」（約 13-15 世紀）、「傳教士漢學」（約 16-18 世紀）、「專業漢學」（19 世紀以降）三階段。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導言〉，頁 1-7。

⁷⁴ 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 3 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新史

本土學者對「經學」的關注都正在消滅或轉向，又怎能將相關概念，完整傳遞給西方學者呢？即如學界公認最為重要的中國經典英譯者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段懷清曾分析其在中國交往的知識分子，專治傳統學術者少，而以具初步新學知識者多；⁷⁵ 理氏有傳教士身分，對《春秋》的翻譯，甚至部分頗肖似《聖經》用字，但學者仍或批評其「不甚明白《春秋》『經世』的含義」。⁷⁶ 換言之，在西方漢學走向專業化伊始，傳統經學的影響恐怕就不如想像中顯著，反而古史辨的懷疑傾向與史料考證方為當時學術熱點，魯惟一 (Michael Loewe)、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討論到古史辨與西方漢學的關係：

顧頡剛有意識地採用了考古學的術語來建立所謂「層累」的研究方法，……在傾向對事物抱有懷疑態度的西方漢學家當中，這種疑古精神自然受到熱烈歡迎。⁷⁷

本文並不是說西方漢學家還停留在古史辨階段，而是意圖指出此一中西學術交匯的特殊時機。若我們回顧前述清代以降的發展：清儒復古學風與對《左傳》文本型態的關注，在學風世變激盪之下，其宗旨與方法由信而疑，由求古經而辨史料。「辨經籍中之古史資料」作為方法，可導向如劉逢祿與古史辨學者以懷疑為主的「劉歆偽作」說，也可如楊向奎以考信史料為手段論證經學價值，或如趙光賢、王和復原《左傳》之編纂與材料來源，推崇其「史」的地位。然而，從西方漢學發展來說，其並未完整經歷這一學術進程。西方學者關注《左傳》編纂的「異質性」遠多於其作為經典的「一致性」，可說源於古史辨之影響；而其認同《左傳》性質不偽而可信，實是重視其作為史料彙編的應用。然而我們要思考的是，趙光賢、王和的研究固然平實理性，肯定了《左傳》豐富而真實不偽的歷史價值，但正如黃進興曾評論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喪失了主體性：

所謂「史學就是史料學」實基於史實不證自明的信念，而今日的史料學

學》，頁 1628。

⁷⁵ 段懷清，〈理雅各與晚清中國社會〉，《漢學研究通訊》，24.2（臺北：2005），頁 46。

⁷⁶ 羅軍鳳，〈當西方史學遭遇中國經學——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與清代《春秋》經學〉，《近代史研究》，1（北京：2015），頁 120。

⁷⁷ 魯惟一、夏含夷，〈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劍橋中國上古史》序言〉，收入夏含夷主編，《古史新聲：《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撰與反響》（北京：三聯書店，2020），頁 51。

卻是將歷史的詮釋權拱手送給其他學科，自己卻淪為資料的提供者。⁷⁸

趙、王二氏猶以《左傳》為史書，但如前述，在西方學術的接受中，恐怕仍有將《左傳》當作「資料提供者」的傾向。則《左傳》研究的主體性在史書與史料間如何立足，仍值得我們深思。

從劉逢祿到古史辨，《左傳》性質與編纂之爭議與多變，在現今兩岸中文學界，或許已難再引發熱議；但其核心要旨與方法卻隱然在西方漢學的相關研究中延續。進一步來說，現今西方《左傳》研究路線，既重視「史」之一面，又很自然地結合其考古學的學術傳統，展開對中國古代文本的寫本研究，則《左傳》的性質與編纂，又面臨新的思考。

四、文本或文物：寫本視角與《左傳》研究

歐美學術界對各種古代文明的寫本關注起源甚早：除固有的《聖經》抄寫本研究外，以廣義東方學來說，寫本與考古研究可說相伴而生，從 19 世紀開始的古埃及紙莎草學 (Papyrology) 研究，到 20 世紀的敦煌寫卷研究，⁷⁹ 一方面見證了歐美漢學研究的支脈源流，另方面也展現其方法與關注，看重物質遺存一面，是不同於中文學界的研究特色。本文第二節論文本型態復古時，引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序》提及文字與載體之遞變。俞書為訓詁名著，標誌清代漢學的重要成果。然其中提及先秦古書的物質變化，在現今堪稱由西方漢學家發其端的寫本研究視角看來，意義又有微妙的位移，別開學術新意。

夏含夷在論及中國古代文獻「不斷重寫」議題時，便引用過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序》的文字，自道其研究關懷：

當我們拿到一篇手寫的文本，然後進行抄寫或編寫，在這個過程中，抄寫者或編寫者起了什麼樣的作用。……研究重寫的過程，就可以發現中國文獻經過了很長的發展過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國古代文獻與真正

⁷⁸ 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頁 257。

⁷⁹ 相關研究綜述參考于欣，〈整體書寫文化史構築芻議：關於東西古寫本研究的思考〉，《敦煌研究》，3（蘭州：2012），頁 52-62。

的原本，恐怕有相當大的差別。⁸⁰

若說俞樾強調傳世文獻載體「為變也屢矣」，乃說明造成各類文字訛誤、文本錯落的「原因」，而對古書內容進行正確的訓詁釋讀，才是其最終追求。那麼夏含夷所強調的「重寫」，則是在傳世與出土文獻的對讀下，盡可能探究此一「為變也屢矣」的傳鈔過程本身，亦即各種異文是「如何造成的」；他指出「編寫、抄寫過程中另外的一個意義，就是文本在不斷地變動」，⁸¹ 觀照文本每一次的變動過程，而非追求唯一解讀，才是其關注要點。此一研究側重，如同史嘉柏針對《劍橋中國上古史》的重要批評：

每一位作者似乎都願意承認，無論是考古發現的還是傳承得來的文獻，其實都是文物；因此像對待任何其他文物一樣，我們一定要從它們產生的特定的環境入手來加以理解。但在實踐中，這一理解卻導致了文獻使用上的巨大分歧。⁸²

將「文獻」當作「文物」觀察，探究其「產生的環境」，其實也與前述西方學者著重「史料」有關：探問文本由哪些材料所形塑，並解析這些材料可能經歷哪些挪移、改造、重組，最後才形成我們所見的《左傳》。

對出土寫本，或者說對「不穩定文本」的重視，結合前述對《左傳》的「史料」分析，表現為以出土文獻的文本抄寫型態為參照，逆推《左傳》可能的編纂過程。例如鮑則岳 (William G. Boltz) 提出「文本構件」(textual building blocks) 概念，認為不論傳世、出土文獻，皆可拆解為以「簡」為單位的構件。他以《左傳》載「神降於莘」事為分析對象，認為其採用過某種一簡 24 字的文本素材。⁸³ 而在與《左傳》史事多有重疊的清華簡《繫年》問世後，相關研究更盛。如夏含夷從《繫年》的紀年形式切入，提出先秦史書有二種主要類型：一者以《春秋》為代表，分年記事且屬於單一國家；一者以《繫年》為代表，年分結構較不清晰，但彙

⁸⁰ 黃曉峰，〈夏含夷談古代文獻的不斷重寫〉，《東方早報》（上海），2009 年 7 月 19 日，第 2 版，轉引自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m.bsm.org.cn/?xiaox/3627.html>，2024 年 7 月 10 日瀏覽）。

⁸¹ 同前引。

⁸² 史嘉柏著，張翰墨譯，〈文本與文物：《劍橋中國上古史》書評〉，收入夏含夷主編，《古史新聲》，頁 208。

⁸³ William G.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50-78.

合多國史事。⁸⁴ 尤銳則在討論清華簡《繫年》的原始資料來源時，以《繫年》與《春秋》、《左傳》相對照，指出：從《繫年》與《左傳》紀錄同一史事的比較來看，二書應有共同引用的原始素材。⁸⁵

寫本研究帶來對「物質特性」、「產生的特定的環境」之關注，確實能與傳統探掘內容義理的學風互補。然而以《左傳》來說，這些依據出土寫本而反推《左傳》書寫與編纂的設想，較諸第二節所論毛奇齡等文本型態復古之論，不同處只在有出土文獻作為間接證據。目前為止，能夠作為「文物」來研究的《左傳》寫本，還未見先秦的材料，至多只有唐寫本；所謂文本「變動的過程」，仍只能觀察中古以降的現象。以下即舉例說明。

《左傳》抄寫材料雖稀少，但並非完全沒有。實際上，杜《注》便曾提及傳文的抄寫問題。現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左傳》（見附圖二），在魯襄公廿五年最末一段載錄：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涇盟。
秦伯車如晉涇盟，成而不結。（卷 36，頁 625）

此條傳文正屬於前文翁方綱、俞樾指出應與下年連讀的例子，因其與襄廿六年《傳》文開頭為一事相續：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卷 37，頁 629）

但引人注意的是，在襄廿五年《傳》文「成而不結」四字下，杜《注》言：

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卷 36，頁 625）

⁸⁴ 夏含夷，〈紀年形式與史書之起源〉，收入陳致主編，《簡帛·經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39-46。

⁸⁵ 尤銳，〈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收入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236-254；Yuri Pines, "History without Anecdotes: Between Zuozhuan and the Xinian Manuscript," in Paul van Els and Sarah A. Queen (eds.),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pp. 263-300; Yuri Pines, "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troducing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T'oung Pao*, 100.4-5 (2014), pp. 287-324.

杜預既言「當繼前年之末」，顯然，他所見「會于夷儀之歲」到「成而不結」一段文字，應當是放在襄廿六年開頭，否則何必特別釐清此段文字「當繼前年之末」？檢索目前最早的《春秋經傳集解》「金澤文庫本」鈔卷，⁸⁶「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郚」一段文字，正是寫在襄廿六年卷首，且位經文之前（見附圖三）。⁸⁷ 金澤文庫本是現存最接近唐寫本樣貌的抄本；⁸⁸ 而由其抄寫樣式，可知所謂「特跳」，即「傳」字以抬頭方式寫出經前。竹添光鴻（1842-1917）《會箋》謂：

觀此注，則杜氏所據之本，傳與經已相牽綴而為一，故于此云「特跳」、云「傳寫」。杜序所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當必有先杜而為之者。⁸⁹

《會箋》以金澤文庫本為藍本，誠如竹添氏所論，這是杜預之前，經傳已相牽綴的證據。⁹⁰

對於這條「特跳此者」的經前之傳，環繞其抄寫與相關編纂議題，我們至少可以展開三個子題討論：

第一，杜預對於其所見襄廿六年「經前有傳」的傳文位置，認為「傳寫」有誤，但並未改動其位置，僅加註說明。檢索唐石經（見附圖四）、⁹¹ 宋嘉定九年

⁸⁶ 杜預注，《春秋經傳集解》，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漢籍集覽」（<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日本金澤文庫本鈔卷，2024年2月1日瀏覽），卷18，無頁碼。

⁸⁷ 「跳」者，孔《疏》：「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故杜以『跳』言之。」（卷36，頁625）楊慎《丹鉛總錄》則說「跳」即今書寫「另起一行」的「抬頭」。楊慎，《丹鉛總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55冊，卷12，頁38。

⁸⁸ 金澤文庫本首次見載目錄，為1802年尾崎雅嘉所著《群書一覽》。中國學者接觸到此本，最早應是楊守敬1882年駐日時抄寫回的本子。關於此本年代，一般認為是唐寫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標榜為「六朝遺經」。計小豪指出其祖本當為唐代傳入，但據實物觀測可見抄手註記，實則經過北條氏三代手抄，年代約當宋元時期。島田翰撰，杜澤遜、王曉娟點校，《古文舊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55-58；計小豪，《金澤文庫《春秋經傳集解》鈔卷校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頁10-12。

⁸⁹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第3冊（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1439。

⁹⁰ 換言之，若杜預乃「分傳附經」的第一人，那他大可依照自己對傳文的理解，將其編排至他認為該在的位置，而非對某段「當繼前年之末」的傳文出現在經文前而感到困惑，並將其理解為「傳寫失之」。更多討論可參考蔡瑩瑩，〈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頁34-41。

⁹¹ 中華書局編，《景刊唐開成石經》（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801（附圖四左）；高峽主編，《西安碑林全集》第158卷（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頁1821-1822（附圖四右）。

(1216)「興國軍學本」(見附圖五)，⁹² 以及明代覆刊宋淳熙三年(1176)閩氏種德堂巾箱本、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影刊元相臺岳氏本等資料，⁹³ 此條傳文的位置都在襄廿六年經文之前；改移到襄廿五年傳文末段，阮元〈校刊記〉認為是「宋十行本之誤」，則此段落變動，概在刻本時代以後。進一步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後人根據杜預言「當繼前年之末」，遂直接改動了這段文字。安井息軒(1799-1876)《左傳輯釋》即曰：

據傳例，「會于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哉」〔案：即襄廿五年傳文最末段〕，但以簡編爛脫，後人超行寫之，杜合經傳時，欲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首，因加一「傳」字以別之，至唐石經，皆仍其舊。宋人始據傳例，改置之二十五年之末，於義是也，而仍不刪「傳」字則失之。⁹⁴

就此例言，文本的變動並不來自寫本時代，而來自版本時代；宋人疑經改經，學界已多有認識，此一文本改動發生在宋代，可說是合理推測。寫本研究強調「重寫」帶來文本的不穩定，固然值得重視，但造成不穩定的因素，並不只有「手抄」一端。

第二，承上，宋代以後這段傳文改易位置，最可能是根據杜預的意見；但有趣的是，此段文字可能並非杜預所認定的「失誤」，而應如前述翁方綱、俞樾所論，此一不拘「經文橫隔」，「為下年《傳》著緣起者，皆特跳出寫之」⁹⁵ 的文本型態，才是《左傳》較早的面貌。是故他們嚴詞批評杜預拘執於「經前不得有傳」的想法，遂與《左傳》舊貌失之交臂。⁹⁶ 但在翁、俞提出「古本說」之前，不只上引安井息軒贊同杜預的判斷，孔穎達也支持杜說：

⁹² 杜預注，《春秋經傳集解》(宋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學刻本)，卷18，頁1。今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附圖五左)；另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附圖五右)。相關研究見張麗娟，〈說說南宋興國軍學刻本《春秋經傳集解》〉，收入杜澤遜主編，《國學茶座》(總第三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頁18-25。

⁹³ 上述二本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之「古籍善本」。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2024年2月1日瀏覽)。

⁹⁴ 安井息軒，《左傳輯釋》(臺北：廣文書局，1967)，卷16，頁37。

⁹⁵ 翁方綱，《分年系傳表》，頁10b-11a。

⁹⁶ 不過，就筆者目前查閱，金澤文庫本僅此一條。翁、俞提出其他「分年」例子，金澤文庫本仍呈現一事前後分割為二，與今本無異。也就是目前的版本證據，距離翁、俞想全面回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之前的《左傳》舊貌，還有一段距離。

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傳在前卷之末，豫為後卷之始。此為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其事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卷 36，頁 625）

換言之，就版本來看，這段傳文有很長一段時間，穩定維持在襄廿六年經文之前，但這個段落配置，又被主流意見認為是錯誤的。則我們可說，《左傳》文本，「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固然「為變也屢」，但其中也有縱使主流或主觀上認定為錯誤者，在客觀型態上仍未輕易變更，這其中緣由，或許仍是尊經觀念使然。若我們嘗試將古典文本當作「文物」，理解其「產生的特定的環境」，則歷代學者的經學觀念，仍須納入考慮，然而如上節所述，西方漢學界的《左傳》研究，多以史料編纂為主要切入點，則如何將傳統經學觀念與文化，納入對文本產生環境的考察，應是寫本研究值得開拓的面向。

第三，聚焦在金澤文庫本的書寫型態，其作為目前最早的完整手抄本，在追尋古本的清儒眼中價值如何，頗值得討論。俞樾與竹添光鴻頗有交情，晚年曾為《會箋》作序，應見過其所據金澤文庫本概況。⁹⁷ 又其為竹添氏弟子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作序時則明確提及：

舊鈔本《春秋集解》所標識「經」、「傳」字皆在欄上，為經傳初合之本。⁹⁸

這段話其實來自島田氏對此本的描述：

年首「經」、「傳」二字皆在欄上，是始合經、傳時所題以別之，其在欄上，體例固當然也。開成之刻於石，既無欄界，故連書之。而北宋以來刻本，接入諸欄內，與本經無別。⁹⁹

島田氏指出因石經「無欄界」（見附圖四）之故，導致後世刻本的「經、傳」字位置改入於欄內，其善於觀「物」，是很好的推論。但「經傳初合」一說就顯然不夠

⁹⁷ 俞樾在 1877 年左右與竹添氏定交，約在 1904 年左右收到《左氏會箋》書稿，1907 年井井書屋重版再印《左氏會箋》時，增加了俞〈序〉，此年也是俞樾卒年。

⁹⁸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頁 1。

⁹⁹ 同前引，頁 55-58。

準確，如前所論，光憑襄廿六年卷首的經前之傳與杜《注》，就可知在此本之前，傳文與經文已有初步的拼合。我們只能說此本應很接近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樣貌，但不會是經傳初次合併。另外，島田翰曾與俞樾進行筆談，〈春在堂筆談〉記俞樾對於島田翰據舊鈔本校訂今本文字，也不完全贊同：

舊鈔本《春秋經傳集解》，自是古本之可信者。僖三十三年《傳》加一「曰」字，足證《開成石經》之誤奪。至二十八年「曹人兇兇懼」，竊恐不然。《左氏》原文自作「曹人兇懼」，觀下文「因其兇也而攻之」不疊「兇」字，知上文亦不疊「兇」字也。杜氏因「懼」字不待解說，而「兇」字不可無解，故以「兇兇，恐懼聲」解之。以重言釋一言，古傳注字多有此例，……竊謂貴國古本皆由敝國傳寫而去，傳刻者固多誤，而傳寫者亦未必無誤，學者當善讀之。¹⁰⁰

如前文談及，俞樾留心於文本的物質特性，欲恢復《左傳》古本，又略能見到舊鈔卷本，其對「寫本」的認識與態度，實值得深入探索。

上述討論，雖僅有單一材料，但仍足以呈現《左傳》在寫鈔、傳刻過程中片段變化與固著之跡。前述關注「史料編纂」，強調文本歷經「不斷重寫」的研究方向，其實正可在清儒的論述中尋求會通的可能性，也應更關注《左傳》的相關版本材料。比較可惜的是前述「寫本」研究，尚未結合這方面的《左傳》寫本、刻本資訊進行討論。

五、出土文獻的歷史書寫參照

上節指出當前寫本與《左傳》之研究，雖為極新的議題，但學者據上古之寫本，卻忽略中古以降傳刻之書，不免可惜。從另一面來說，如本文第二節提到毛奇齡的想法，確實可能在出土文獻上獲得部分支持。出土文獻雖不等於《左傳》早期的文本型態，但也能從中觀察先秦書寫的具體狀況。比如我們可以問：先秦時期的歷史敘事作品，如何分出章節或段落？前述翁方綱、俞樾談及《左傳》敘事「分年」的問題，現今已有不少以春秋歷史為主題，且章節架構較長的出土敘史文本，

¹⁰⁰ 同前引，頁422。

略能提供參照。茲以清華簡《繫年》與《越公其事》為例，試論其分章議題。

(一) 晉靈公之立：持續性事件的敘事彈性

清華簡《繫年》第九、十章敘述晉靈公之立，雖未如《春秋》、《左傳》細載年時月日（詳下），但基本為順時敘事，二章共計六簡，分別為簡 50-55（引文中 A-E 為筆者所加）：

第九章：

晉襄公卒，〔A〕靈公高幼，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強君」，乃命【簡 50】左行蔑與隨會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B〕襄而〔夫〕¹⁰¹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曰：「死人何罪？【簡 51】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將寘此子也？」大夫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簡 52】之。」乃立靈公，〔C〕焉葬襄公。〔B'〕^L【簡 53】

第十章：

秦康公率師以送雍子，晉人起師，敗之于葭陰¹⁰²。〔D〕左行蔑、隨會不敢歸，遂【簡 54】

奔秦。靈公高立六年，秦公以戰于葭陰之故，率師為河曲之戰。〔E〕^L【簡 55】¹⁰³

第九章簡 53「葬襄公」後，有墨勾表示章節結束，餘簡留空不書（附圖六）；第十章簡 54「秦康公率師」以另簡書之，為第十章開頭。為討論方便，將此事分為五個主要情節：A. 襄公卒，B. 晉國大夫謀立公子雍並葬襄公，C. 穆嬴抱靈公爭立，D. 秦送公子雍返晉無果、秦晉戰於葭陰，E. 先蔑與士會奔秦。

對照《左傳》文六、七年同事件的記載：

¹⁰¹ 此字為「夫」之錯字，原整理者隸為「而」，華東讀書小組與蘇建洲均指出字形當為「天」。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三）〉，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m.bsm.org.cn/?chujian/5801.html>，2024 年 9 月 18 日瀏覽）；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編著，《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2013），頁 421。

¹⁰² 整理者注釋指出該詞可通讀為《左傳》所記地名「葭陰」，下文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 159。

¹⁰³ 同前引，頁 157、159。

文六年：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A〕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B〕

文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衛。〔D〕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C〕以禦秦師。……及葭陰。……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剖首。〔D'〕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E〕（卷19上，頁315、317-318）

《左傳》所記明確時間點（方框處）有四：六年八月乙亥、冬十月、七年（四月）戊子、己丑。就時間標記言，《繫年》沒有明確的年數，這是較大的差異。但就事件內容言，則《左傳》與《繫年》皆五事具備，也都須二年／二章連讀，才能完整呈現晉大夫改立靈公而導致秦晉戰爭的始末。

五個情節中，事件 A、B、D、E 在《左傳》都有日期紀錄；唯 C 事件「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無具體時間點，在二書中所屬段落、次序明顯不同，分年／分章方式亦異。就《繫年》來說，其似乎是依據「晉國內政」與「秦晉戰爭」的事件性質不同，將「穆嬴抱靈公爭立」放在第九章，時序上插在 B 事件當中，即「立公子雍」與「葬襄公」之間。第十章則不談晉國內政，只寫秦晉戰爭，甚至探下敘及河曲之戰。而《左傳》寫「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順序較後，於文七年提出並安插在 D 事件當中，即「秦送公子雍返晉」與「戰於葭陰」之間，這似乎是為了強調晉國之所以反悔背秦並導致戰爭，皆穆嬴爭立其子所致。

進一步言，由「日抱」一詞可看出：這並非發生一次即結束的事件，而可能自六年謀立長君開始，就持續發生。這種時程較長而較無法定出單一時間點的持續性事件，在敘事中的順序與作用，可說更具情節編輯上的彈性。是以《左傳》和《繫年》講此二事順序顛倒，可說各具分年／分章的合理性，也不妨礙整體情節的推動與邏輯，只是呈現了觀看歷史的不同視角。

(二) 吳越戰爭：文辭表現與分段關係

吳越爭霸是春秋晚期重要的南方敘事主題，《左傳》、《國語》、戰國諸子皆有敘述徵引，也見於清華簡第七冊《越公其事》。吳越爭霸初期的重要情節有三：1. 越王勾踐戰敗求和，2. 吳王夫差與伍子胥論辯「和或戰」，3. 最終吳許越成。三事件涉及不同國家、人物之往來與言談，但又因果緊密，則其是否分段？如何分段？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即有各種不同表現。

單論時間點，上述三情節都在魯哀元年，無跨年度問題，故《左傳》的相關敘述並無分段（引文前編號為筆者所加，分別對應上述 1、2、3 情節，下同）：

1.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2.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3.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卷 57，頁 990-992）

在《左傳》，篇幅較長者乃情節 2，即夫差與伍員爭論是否與越和談的對話；情節 1 與 3 皆僅簡單敘述而無言論。

對照之下，《國語》的情節 1、2 均有長篇言論，情節 3 的對話最為簡短。《越公其事》則是三個情節都紀錄了長篇的言辭，這也導致二書將同一事件切分成二至三個章節。以下略述之：

就情節 1「勾踐求和」言，《國語·吳語》和《越公其事》都紀錄了越國使臣（諸稽郢／大夫種）前往吳國的長篇「求成」文辭，故二書的情節 1 均自成一章，即第一章。¹⁰⁴ 情節 2、3 則兩書發生分歧，《國語·吳語》的情節 3 言論篇幅很短，故與情節 2 共構為第二章〈吳王夫差與越荒成不盟〉：

2.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

¹⁰⁴ 限於篇幅，文長不引。見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越王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頁 536-539。

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3. 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¹⁰⁵

此章有三個表達語意順承、情節接續的「乃」字：「乃告諸大夫」表現出情節 2（討論許成）對情節 1（越求成）的承繼。「乃許之成」表現情節 3（談和）對情節 2 的接續。「吳王乃許之」則為情節 3 作結。由此我們可說，只考量語意承接的話，《吳語》的第一章（即情節 1）和本章（情節 2、3）也可以合併為一章，如此就與《左傳》相似，但之所以分章，可能就是考量篇幅所致。

相對的，《越公其事》情節 2 或 3 的篇幅都很長，都足以自成一章，即其第二、三章。尤其《越公其事》的第三章並不涉及《左傳》、《國語》「荒成不盟」的情節，而是罕見、長篇的「夫差許成」之辭，其編／作者可能出於篇幅均等的考量，將其獨立為一章。值得注意的還有二章銜接處的抄寫方式：

第二章末：

〔申胥〕懼，許諾。┘【簡 15 上】

第三章首：

吳王乃出，親見使者曰：「君越公不命使人而大夫親辱……。【簡 15 下】¹⁰⁶

此二章首尾抄於同簡，中間以墨勾與空白段分隔（見附圖六），可見清晰的分章意圖；但由第三章「乃」字可知敘述語氣仍相銜接。換言之，《越公其事》的作者／抄寫者，一方面既清楚認知二章情節相延續，另一方面又刻意將其分章。如此章節設計的原因可能是：為展現更多文辭表現並顧及篇幅均等，區別言論的對象（第一章為越使對吳王、第二章為吳王與申胥、第三章為吳王對越使）。換言之，某些在「情節、年分」上連續、不需分割的事件，考量到文辭篇幅、人物等其他因素，就有分割的可能。

¹⁰⁵ 同前引，頁 539-540。

¹⁰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109、122。

上舉二則出土寫本與傳世古書記載相同史事，「分章」方式卻可見差異的例子，希望提出二點思考：第一，我們固可如翁方綱、俞樾根據情節、敘事語氣之連續特性，將《左傳》中某些「系列事件」視為一組，認為其「牽連為文，初無間隔」，當連讀而不應拆分，甚至該統一置於某年才是合理的。但編年敘事只是歷史書寫的一種方式，不同形制的文獻及其編／鈔者，所認識的事件性質、章節內涵不同，也就會形成不同的分章方式與事件安排。尤其長時段、跨年度的事件（如「穆嬴日抱大子」），本身無法訂出具體的時間點而屬「持續狀態」時，就更加有敘述次第的彈性。

第二，吳越相關對話，說明了「分段」的標準不僅年分或情節，而可能有更多變因。先秦時期的「語」類與短篇事例往往有很大的篇幅彈性，亦即人物話語內容會因應敘事者的使用目的而可長可短。亦即，在《左傳》集中於一個時間點敘畢的事件，在其他文獻中可能因為對話內容的變化，轉變為二章（《國語》）甚至三章（《越公其事》）的方式呈現，而這些分段方式在不同體系架構內，都是合理的。綜合考量上述多元的歷史敘事章節形式，或許可說，前人多方設想《左傳》尚未「分年附經」的「古本」型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先秦時期的歷史敘事並非只有單一型態，尤其在出土文獻的對照下，先秦歷史書寫的形制與體裁，極可能比過往的想像更為蓬勃多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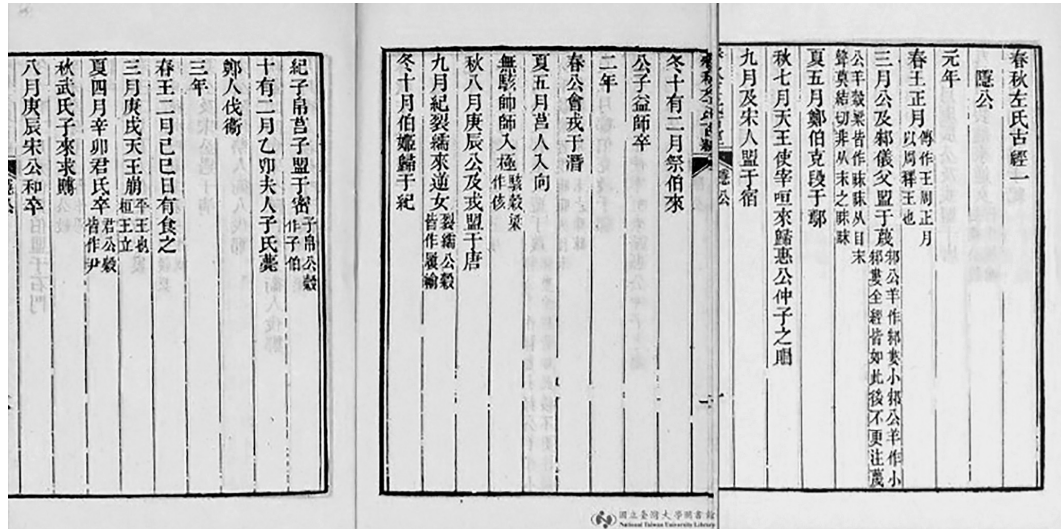
六、結論

自清代到近代，學者對《左傳》性質之討論，由經書而史書，由史書而史料；對其編纂之考索，由復原古經、古本之文本型態，一變為考證「左氏春秋」之舊文，此後疑古者以為殘篇闕文，考信者以為史料彙編，其為變也屢矣。而從清代漢學到西方「漢學」，古人傳刻之書，又面臨了當今出土之寫本，《左傳》也面臨了史書或史料，文本或文物的思考辯證。

本文梳理此間學術流變，針對《左傳》文本的編纂議題從清代到近世的發展，在第二節回顧清代部分學者環繞《春秋》經、傳的「文本型態」復古，提出翁方綱與俞樾的研究，乃從史事連貫切入，反推《左傳》古本的型態，指出其不同於其他學者考訂古經文字，而指出「史事」一路的特色。第三節討論劉逢祿、趙光賢、王和及相關史源考辨之說。指出劉氏雖亦復原「左氏舊文」的文本型態，卻在性質上分解經史，斷不承認其與「經」之關係；其後古史辨、新史學思潮繼起，史料考辨

之法，廣泛影響各類《左傳》研究，尤其西方漢學對《左傳》性質與編纂的接受，亦與此研究路線相契。第四節述評西方學界由寫本觀念展開對《左傳》與先秦歷史書寫的相關研究，指出對寫本的重視，既符合其西方漢學講究考辨史料的立場，並與考古學重視物質遺存的觀念相關。不過本文也提出，以《左傳》研究言，目前的寫本研究，對《左傳》中古寫本還需更多關注，尤其尚待結合經學、版本學相關研究。第五節接續「寫本」之議，提出二則出土文獻呈現史事書寫與章節特徵，指出：歷史文本如何分割或合併，除事件因果連繫與年分之外，敘事者或編鈔者也可能考量其他變因，諸如：長時段難以具體定位在單一時間點的事件、人物的長篇對話、事件的性質分類等。此二節提出具體個案為參照，針對《左傳》編纂議題提出內部與外部的些許參照，希望呈現今日學界所見材料與觀念，其實都有更多元而開闊的可能性。透過上述討論與思索，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立場雖不免看似對立，然追索其淵源，或仍有脈絡潛通；而當代紛至沓來的材料與觀念，固為學術新潮，然回顧舊說，或也有彼此啟發與會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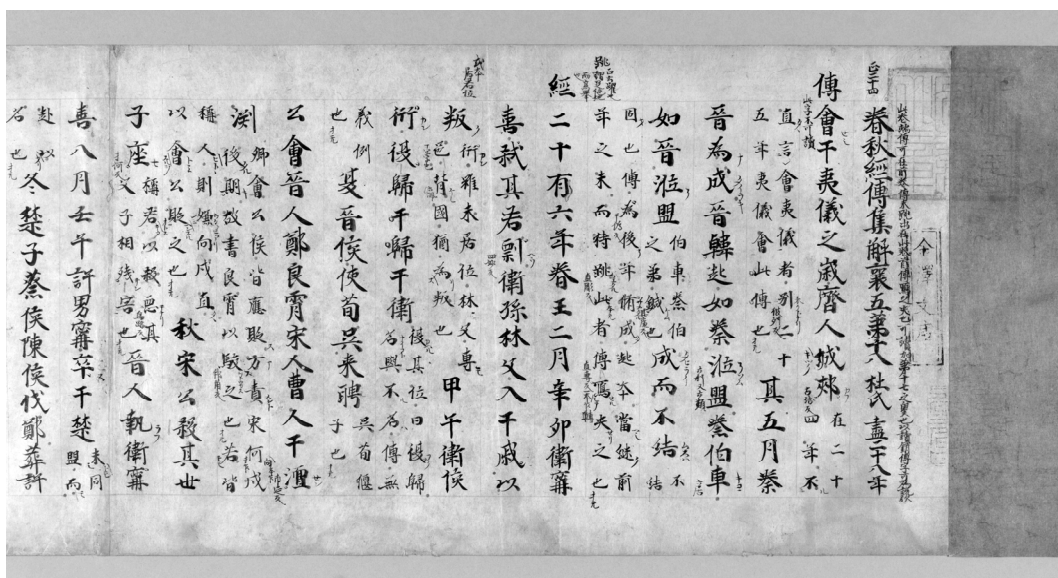
（責任校對：廖安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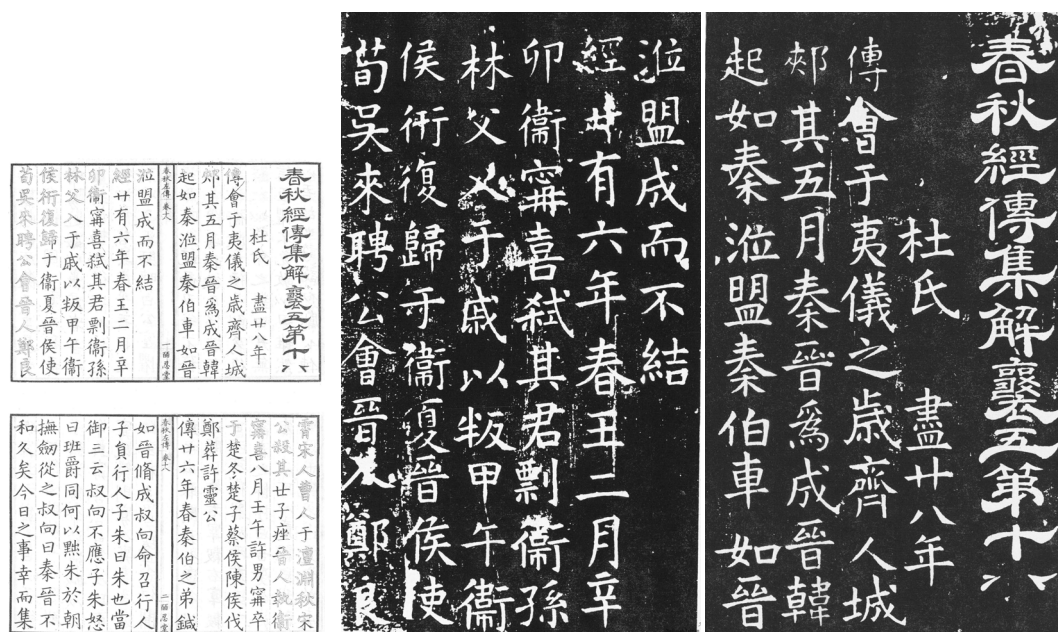
附圖一：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經》



附圖二：十三經注疏本《春秋左傳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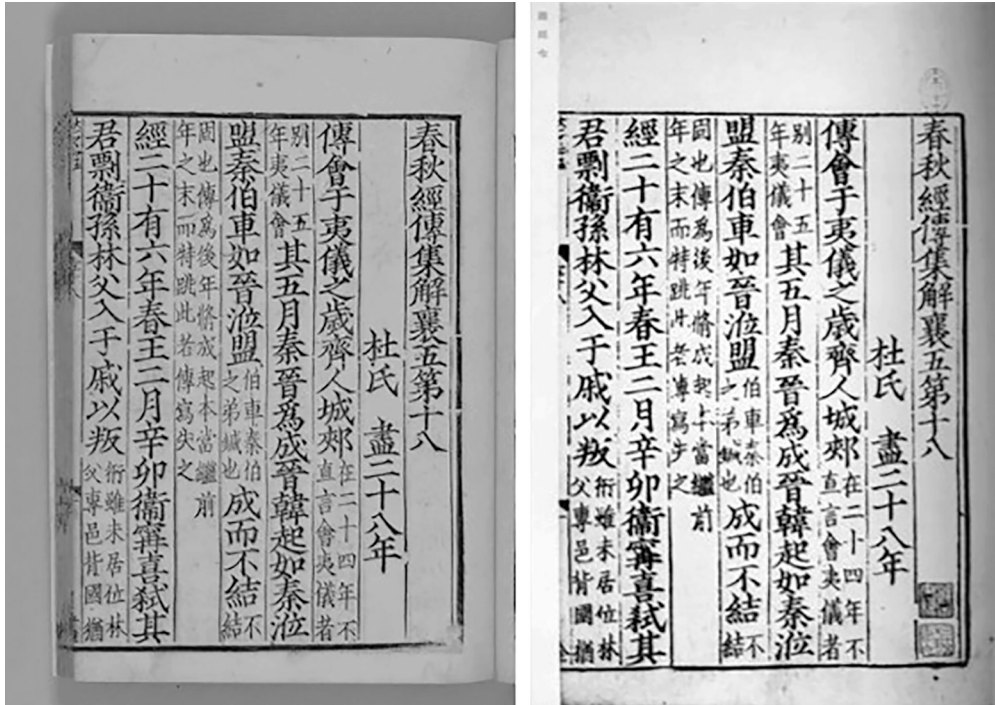
附圖三：金澤文庫本《春秋經傳集解》鈔卷



左圖：頤應堂《景刊唐開成石經》

右圖：《西安碑林全集》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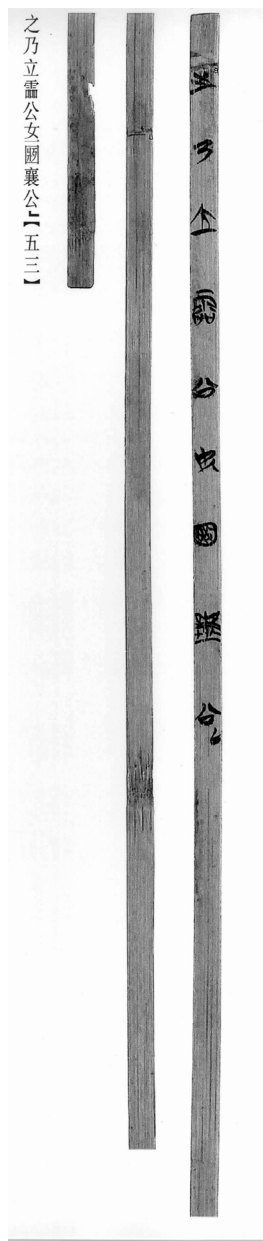
附圖四：《開成石經》：《春秋經傳集解》



左圖：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

右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附圖五：興國軍學本《春秋經傳集解》



左圖：清華簡二《繫年》簡 53



右圖：清華簡七《越公其事》簡 15

附圖六：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毛奇齡 Mao Qiling, 《春秋毛氏傳》 *Chunqiu Maoshi zhua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76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_____, 《春秋簡書刊誤》 *Chunqiu jianshu kanw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76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王先謙 Wang Xianqian, 《漢書補注》 *Hanshu buzhu*,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 1988。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編, 《景刊唐開成石經》 *Yingkan Tang Kaicheng shiji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安井息軒 Yasui Sokken, 《左傳輯釋》 *Zuozhuan jishi*, 臺北 Taipei: 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 1967。
- 竹添光鴻 Takezoe Kōkō, 《左氏會箋》 *Zuoshi huijian* 第 3 冊,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2008。
- 杜 預 Du Yu 注, 《春秋經傳集解》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Riben Gongneiting shulingbu, 「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漢籍集覽」 “Gongneiting shulingbu shoucang Hanji jilan”, <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 日本金澤文庫本鈔卷 Riben Jinze wenkuben chaojuan, 2024 年 2 月 1 日瀏覽。
- _____, 《春秋經傳集解》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嘉定九年 (1216) 興國軍學刻本 Riben Gongneiting shulingbu cang Song Jiading jiu nian (1216) Xingguo junxue keben。
- _____, 《春秋經傳集解》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嘉定九年 (1216) 興國軍學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Song Jiading jiu nian (1216) Xingguo junxue keben。
- 杜 預 Du Yu 注, 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 阮元 Ruan Yuan 校勘, 《春秋左傳注疏》 *Chunqiu Zuozhuan zhushu*, 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2013, 據清嘉慶二十年 (1815) 江西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影印 Ju Qing Jiaqing ershi nian (1815) Jiangxi Nanchang fuxue Shisanjing zhushu ben yingyin。

- 侯 康 Hou Kang, 《春秋古經說》 *Chunqiu gujing shuo*, 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3664 冊,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37。
- 俞 樾 Yu Yue, 《春在堂全書》 *Chunzaitang quanshu* 第 1、3 冊,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 俞 樾 Yu Yue 等, 《古書疑義舉例五種》 *Gushu yiyi juli wu zhong*,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6。
- 段玉裁 Duan Yucai, 《春秋左氏古經》 *Chunqiu Zuoshi gujing*, 收入嚴一萍 Yan Yiping 主編, 《百部叢書集成》 *Baibu congshu jicheng* 第 1082 冊, 新北 New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1968, 景清光緒鮑廷爵校刊《後知不足齋叢書》所收經韻樓原刻本 Ying Qing Guangxu Bao Tingjue jiaokan *Hou Zhibuzuzhai congshu suo shou Jingyunlou yuankeben*。
- 洪亮吉 Hong Liangji 著, 李解民 Li Jiemin 點校, 《春秋左傳詁》 *Chunqiu Zuozhuan g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4。
- 高 峽 Gao Xia 主編, 《西安碑林全集》 *Xi'an beilin quanji* 第 158 卷, 廣州 Guangzhou: 廣東經濟出版社 Guangdong jingji chubanshe, 1999。
- 徐元誥 Xu Yuangao 撰, 王樹民 Wang Shumin、沈長雲 Shen Changyun 點校, 《國語集解》 *Guoyu jijie*,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翁方綱 Weng Fanggang, 《春秋分年系傳表》 *Chunqiu fennian xizhuan biao*,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三年博古齋影印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Fu Sinian tushuguan cang Minguo shisan nian Boguzhai yingyinben。
- 翁方綱 Weng Fanggang 著,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 Bokelai Jiazhou daxue Dongya tushuguan 編, 《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 *Weng Fanggang jingxue shougao wu zhong* 第 5 種第 1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6。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 wenxian yanjiu yu baohu zhongxin 編, 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er)*,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1。
-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qi)*,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7。
- 楊 慎 Yang Shen, 《丹鉛總錄》 *Danqian zonglu*,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子部第 855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 劉逢祿 Liu Fenglu, 《左氏春秋考證》 *Zuoshi chunqiu kaozheng*, 收入阮元 Ruan Yuan 輯, 《皇清經解》 *Huangqing jingjie*, 《廣州大典》 *Guangzhou dadian* 第 15 輯經部總類第 21 冊, 廣州 Guangzhou: 廣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 2015, 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 (1829) 廣東學海堂刻咸豐十年 (1860) 補刻本影印 Ju Guangdongsheng li Zhongshan tushuguan cang Qing Daoguang jiu nian (1829) Guangdong Xuehaitang ke Xianfeng shi nian (1860) bukeben yingyin。
- , 《臧膏肓評》 *Zhengaohuang ping*, 收入阮元 Ruan Yuan 輯, 《皇清經解》 *Huangqing jingjie*, 《廣州大典》 *Guangzhou dadian* 第 15 輯經部總類第 21 冊, 廣州 Guangzhou: 廣州出版社 Guangzhou chubanshe, 2015, 據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 (1829) 廣東學海堂刻咸豐十年 (1860) 補刻本影印 Ju Guangdongsheng li Zhongshan tushuguan cang Qing Daoguang jiu nian (1829) Guangdong Xuehaitang ke Xianfeng shi nian (1860) bukeben yingyin。
- 鍾文烝 Zhong Wenzheng 撰, 駢字騫 Pian Yuqian、郝淑慧 Hao Shuhui 點校,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 *Chunqiu Guliang jingzhuan buz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6。
- 魏了翁 Wei Liaoweng, 《春秋左傳要義》 *Chunqiu Zuozhuan yaoy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53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6。

二、近人論著

- 于 欣 Yu Xin, 〈整體書寫文化史構築芻議：關於東西古寫本研究的思考〉“Zhengti shuxie wenhuashi gouzhu chuyi: guanyu dongxi guxieben yanjiu de sikao”, 《敦煌研究》 *Dunhuang yanjiu*, 3, 蘭州 Lanzhou: 2012, 頁 52-62。doi: 10.13584/j.cnki.issn1000-4106.2012.03.015
- 尤 銳 Yuri Pines, 〈從《繫年》虛詞的用法重審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繫年》原始資料的來源〉“Cong *Xinian* xuci de yongfa chongshen qi wenben de kekaoxing: jian chutan *Xinian* yuanshi ziliao de laiyan”, 收入李守奎 Li Shoukui 主編, 《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 *Qinghuajian Xinian yu gushi xintan*,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6, 頁 236-254。
- 王 和 Wang He, 《左傳探源》 *Zuozhuan tanyuan*,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9。doi: 10.978.75201/51986
- 王汎森 Wang Fan-sen,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 *Gushibian yundong de xingqi: yi ge sixiangshi de fenxi*, 臺北 Taipei: 允晨文化 Yunchen wenhua, 1987。

- _____, 〈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Cong jingxue xiang shixue de guodu: Liao Ping yu Meng Wentong de lizi”, 《歷史研究》*Lishi yanjiu*, 2, 北京 Beijing: 2005, 頁 59-74。
- 王靖宇 John Ching-yu Wang, 〈美國的《左傳》研究〉“Meiguo de Zuozhuan yanjiu”,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3.1, 臺北 Taipei: 1993, 頁 72-80; 後收入王靖宇 John Ching-yu Wang, 《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Zhongguo zaoqi xushiwen yanji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3, 頁 218-229。
- 王學典 Wang Xuedian、李梅 Li Mei、孫延杰 Sun Yanjie,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增訂本）》*Gu Jiegang he ta de dizimen (zengdingb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1。
- 伊維德 Wilt L. Idema 著, 丁涵 Ding Han 譯, 〈關於中國文學史中物質性的思考〉“Guanyu Zhongguo wenxueshi zhong wuzhixing de sikao”, 《中正漢學研究》*Zhongzheng Hanxue yanjiu*, 21.1, 嘉義 Chiayi: 2013, 頁 1-14。
- 朱曉雪 Zhu Xiaoxue, 《包山楚簡綜述》*Baoshan Chujian zongshu*, 福州 Fuzhou: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2013。
- 何 寅 He Yin 主編, 《國外漢學史》*Guowai Hanxue 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 2000。
- 余英時 Yu Ying-shih,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Zhongguo sixiang chuantong de xiandai quansh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99。
- 李丹鳳 Li Danfeng, 〈沿流溯源：《左傳》文本來源研究的新進展——讀王和先生《左傳探源》〉“Yanliu suyuan: Zuozhuan wenben lai yuan yanjiu de xin jin zhan: du Wang He xiansheng Zuozhuan tanyuan”, 《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 4, 開封 Kaifeng: 2021, 頁 119-127。
- 李惠儀 Li Wai-yee 著, 文韜 Wen Tao、許明德 Xu Mingde 譯, 《左傳的書寫與解讀》*Zuozhuan de shuxie yu jiedu*, 南京 Nanjing: 江蘇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2016。
- 沈玉成 Shen Yucheng、劉寧 Liu Ning, 《春秋左傳學史稿》*Chunqiu Zuozhuanxue shigao*, 南京 Nanji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1992。
- 車行健 Che Hsing-chien, 〈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Lun Yang Xiangkui de jing jinguwenxue guan”, 《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21, 臺北 Taipei: 2014, 頁 59-96。doi: 10.30407/BDCL.201406_(21).0004
- 林慶彰 Lin Ching-chang, 《清初的群經辨偽學》*Qingchu de qunjing bianweixue*, 臺北 Taipei: 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 1990。

- _____, 《明代經學研究論集》 *Mingdai jingxue yanjiu lunji*,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 shi zhe chubanshe, 1994。
- _____, 《清代經學研究論集》 *Qingdai jingxue yanjiu lunji*,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2002。
- 姚曼波 Yao Manbo, 《《春秋》考論》 *Chunqiu kaolun*, 南京 Nanjing: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2。
- 胡念貽 Hu Nianyi, 《中國古代文學論稿》 *Zhongguo gudai wenxue lungao*,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7。
- 計小豪 Ji Xiaohao, 《金澤文庫《春秋經傳集解》鈔卷校勘研究》 *Jinze wenku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chaojuan jiaokan yanjiu*, 南京 Nanjing: 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Nanjing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 2019。doi: 10.27245/d.cnki.gnjsu.2019.001382
- 段懷清 Duan Huaiqing, 〈理雅各與晚清中國社會〉“Liyage yu wan Qing Zhongguo shehui”, 《漢學研究通訊》 *Hanxue yanjiu tongxun*, 24.2, 臺北 Taipei: 2005, 頁 43-48。
-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紀年形式與史書之起源〉“Jinian xingshi yu shishu zhi qiyuan”, 收入陳致 Chen Zhi 主編, 《簡帛·經典·古史》 *Jianbo, jingdian, gu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3, 頁 39-46。
-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主編, 《古史新聲:《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撰與反響》 *Gushi xinsheng: Jianqiao Zhongguo shanggushi de bianzhuan yu fanxiang*,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20。
- 孫康宜 Kang-i Sun Chang、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主編, 劉倩 Liu Qian 等譯, 《劍橋中國文學史》 *Jianqiao Zhongguo wenxueshi*,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 2013。
- 島田翰 Shimada Kan 撰, 杜澤遜 Du Zexun、王曉娟 Wang Xiaojuan 點校, 《古文舊書考》 *Guwen jiushu kao*,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4。
- 徐仁甫 Xu Renfu, 《左傳疏證》 *Zuozhuan shuzheng*, 成都 Chengdu: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1981。
- 國立故宮博物院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典藏資料檢索」“Gugong diancang ziliao jiansuo”,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 2024 年 2 月 1 日瀏覽。
- 張西平 Zhang Xiping, 《歐洲早期漢學史》 *Ouzhou zaoqi Hanxue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9。

- 張素卿 Chang Su-ching, 《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Qingdai Hanxue yu Zuozhuanxue: cong "guyi" dao "xinshu" de mailuo*,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出版 Wunan tushu chuban, 2020。
- 張舜徽 Zhang Shunhui, 《漢書藝文志通釋》*Hanshu yiwenzhi tongshi*, 武漢 Wuhan: 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 1990。
- 張麗娟 Zhang Lijuan, 〈說說南宋興國軍學刻本《春秋經傳集解》〉“Shuoshuo Nansong Xingguo junxue keben *Chunqiu jingzhuan jijie*”, 收入杜澤遜 Du Zexun 主編, 《國學茶座》(總第三期) *Guoxue chazuo (zong di san qi)*, 濟南 Jinan: 山東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 2014, 頁 18-25。
- 梁啟超 Liang Qichao 著, 吳松 Wu Song 等點校, 《飲冰室文集點校》*Yinbingshi wenji dianjiao* 第 3 集, 昆明 Kunming: 雲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jiaoyu chubanshe, 2001。
- 陳其泰 Chen Qitai, 《春秋公羊學》*Chunqiu Gongyang xue*, 北京 Beijing: 東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1997。
- 陳銘煌 Chen Ming-huang, 《春秋三傳性質之研究及其義例方法之商榷》*Chunqiu sanzhan xingzhi zhi yanjiu ji qi yili fangfa zhi shangque*,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1991。
-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 Huadong shifan daxue Zhongwen xi Zhanguo jian dushu xiaozu,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三)〉“Du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er) xinian shuhou (san)*”, 武漢大學簡帛網 Wuhan daxue jianbo wang, <http://m.bsm.org.cn/?chujian/5801.html>, 2024 年 9 月 18 日瀏覽。
- 黃進興 Huang Chin-shing, 《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Houxiandai zhuyi yu shixue yanjiu*,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2006。
- 黃曉峰 Huang Xiaofeng, 〈夏含夷談古代文獻的不斷重寫〉“Xia Hanyi tan gudai wenxian de buduan chong xie”, 《東方早報》(上海) *Dongfang zaobao (Shanghai)*, 2009 年 7 月 19 日, 第 2 版, 轉引自武漢大學簡帛網 Wuhan daxue jianbo wang, <http://m.bsm.org.cn/?xiaox/3627.html>, 2024 年 7 月 10 日瀏覽。
- 楊向奎 Yang Xiangkui, 《中華學術論文集》*Zhonghua xueshu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1。
- , 《繹史齋學術文集》*Yishizhai xueshu wen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3。
- 楊肅猷 Yang Su-hsien, 〈歷史懷疑論、古物研究與近代歐洲史學的起源〉“Lishi huaiyi lun, guwu yanjiu yu jindai Ouzhou shixue de qiyuan”, 《臺灣師大歷史學

- 報》*Taiwan shida lishi xuebao*, 64, 臺北 Taipei: 2020, 頁 129-186。doi: 10.6243/BHR.202012_(64).0004
- 路新生 Lu Xinsheng, 《經學的蛻變與史學的「轉軌」》*Jingxue de tuibian yu shixue de “zhuangu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6。
- 趙光賢 Zhao Guangxian, 《古史考辨》*Gushi kaobian*, 北京 Beijing: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1987。
- _____, 《孔學新論》*Kongxue xinlun*,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1992。
- _____, 《亡尤室文存》*Wangyoushi wencun*, 北京 Beijing: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1。
- 劉 正 Liu Zheng, 《海外漢學研究：漢學在 20 世紀東西方各國研究和發展的歷史》*Haiwai Hanxue yanjiu: Hanxue zai 20 shiji dongxifang ge guo yanjiu he fazhan de lishi*, 武漢 Wuhan: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2002。
- 劉仲華 Liu Zhonghua, 《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Han Song zhijian: Weng Fanggang xueshu sixiang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2010。
- 歐陽哲生 Ouyang Zhesheng 編, 《傅斯年文集》*Fu Sinian wenji* 第 3 集,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7。
- 蔡瑩瑩 Tsai Ying-ying, 〈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Gelie zhuanwen huo yuanshi yaozhong: lun Zuozhuan ‘fennian’ yu Du Yu ‘zhangben’ shuo”, 《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81, 臺北 Taipei: 2023, 頁 1-70。doi: 10.6281/NTUCL.202306_(81).0001
- 鄭吉雄 Kat Hung Dennis Cheng, 《周易鄭解》*Zhouyi Zheng jie*, 新北 New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23。
- 謝維揚 Xie Weiyang, 《古書形成研究與古史史料學問題》*Gushu xingcheng yanjiu yu gushi shiliao xue went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daxue chubanshe, 2023。
- 謝薇娜 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 〈文學史的建構：從歐洲漢學的書寫傳統論宇文所安的中國文學史觀〉“Wenxueshi de jiangou: cong Ouzhou Hanxue de shuxie chuantong lun Yuwen Suo'an de Zhongguo wenxue shiguan”,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28.1, 臺北 Taipei: 2018, 頁 61-89。
- 羅軍鳳 Luo Junfeng, 〈當西方史學遭遇中國經學——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與清代《春秋》經學〉“Dang xifang shixue zaoyu Zhongguo jingxue: Liyage

- Zhongguo jingdian, Chunqiu yu Qingdai Chunqiu jingxue*”,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1, 北京 Beijing: 2015, 頁 113-125。
- 蘇建洲 Su Jian-zhou、吳雯雯 Wu Wen-wen、賴怡璇 Lai Yi-xuan 編著, 《清華二《繫年》集解》*Qinghua er Xinian jijie*, 臺北 Taipei: 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 2013。
- 顧頡剛 Gu Jiegang 等編著, 《古史辨》*Gushi bian* 第 1、5、7 冊, 海口 Haikou: 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 2003。
- 顧頡剛 Gu Jiegang 講授, 劉起鈞 Liu Qiyu 筆記, 《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Chunqiu sanzhuang ji Guoyu zhi zonghe yanjiu*,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1988。
- Boltz, William G.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50-78.
- Lorusso, Vito et al. “Searching for a Definition of ‘Manuscript,’” *CSMC Occasional Paper*, 1, 2015, pp. 1-12. doi: 10.25592/uhhfdm.9796
- Pines, Yuri. *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hunqiu Period, 722-453 B.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_____. “History without Anecdotes: Between *Zuozhuan* and the *Xinian* Manuscript,” in Paul van Els and Sarah A. Queen (eds.),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ecdotes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pp. 263-300.
- _____.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he Chunqiu Perio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peeches in the *Zuo Zhuan* as Sources of Chunqiu Intellectual History,” *Early China*, 22, 1997, pp. 77-132. doi: 10.1017/S0362502800003254
- _____. “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troducing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T’oung Pao*, 100.4-5, 2014, pp. 287-324. doi: 10.1163/15685322-10045P01
- Schaberg, David.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Vogelsang, Kai. “From Anecdote to History: Observation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uozhuan*,” *Oriens Extremus*, 50, 2011, pp. 99-124.
- Woolf, Daniel R.,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Original Texts versus Manuscripts: A Review of, and Reflection upon, Studies of the *Zuozhuan*'s Compilation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Modern Age

Tsai Ying-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aipei
yingtsai37@utapei.edu.tw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studi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Zuozhuan* 左傳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until modern times. By reviewing the theories of Qing scholars, scrutinizing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al texts” (古本)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Zuozhuan*, this article endeavors to draw comparisons with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aspires to provide reflections on early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compilation.

The article first delves into Qing scholars' pursuit of the *Zuozhuan*'s “original text,” which evolved into an unconventional trend that emphasized the “layout of the original text.” Second, building upon Qing exegetes'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 the *Zuozhuan*, the article re-evaluates Liu Fenglu's 劉逢祿 theory on *Zuoshi chunqiu* 左氏春秋, pointing out that while it aligns with Qing scholars' perceptions of the visual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it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zhuan*'s nature.

The article then discusses the discourse on the *Zuozhuan* advanced by the Debating Antiquity School (*Gushibian xuepai* 古史辨學派) and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ese two groups' focus on the “source of materials” and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signifie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Zuozhuan*, marked by a transition from a classical perspective to a historical one and, eventually, from historiography to material studies.

Final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wo case studies on the existing manuscript of the *Zuozhuan* and the excavated historical text. These case studies aim to provoke reflection and discourse on our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the nature of the *Zuozhuan*.

and the compilation of ancient historical writings.

Key words: *Zuozhuan* 左傳, academics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iography, excavated texts, manuscripts

(收稿日期：2023. 5. 30；修正稿日期：2024. 2. 1；通過刊登日期：2024. 2. 26)